



瞧，这个人

[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王涌 译

Ecce Homo

F. Nietzsche

上海文化出版社
SHANGHAI CULTURAL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Contents

扉页

译序

序言

一 为什么我如此有智慧

二 为什么我如此聪明

三 为什么我能写出这么好的书

《悲剧的诞生》

《不合时宜的考察》

《人性的，太人性的》及其两个续篇

《朝霞：关于道德偏见的思考》

《快乐的科学》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为所有人又不为任何人的书》

《善恶的彼岸：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

《道德的谱系：一本论战著作》

《偶像的黄昏：如何用锤子进行哲思》

《瓦格纳事件：一个音乐家的问题》

四 为什么我是命运

Ecce Homo
F. Nietzsche

瞧，
这个人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王涌 译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瞧，这个人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王涌译.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8

ISBN 978-7-5535-2060-5

I. ①瞧… II. ①弗… ②王… III. ①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自传 IV. ①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35156号

出版人：姜逸青

责任编辑：郑梅

特约编辑：段冶

装帧设计：董歆昱

书名：瞧，这个人

作者：[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

译者：王涌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4.5

插页：4

字数：105千字

印次：2020年8月第1版 202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

书号：ISBN 978-7-5535-2060-5 / K·230

定价：35.00元

译序

尼采的《瞧，这个人》（*Ecce Homo*）写于1888年，在他身后于1908年出版。写完这本书的翌年1月3日，尼采在都灵精神失常，1900年8月25日去世，这期间没有再写出东西。因此，《瞧，这个人》是尼采精神正常时期最后一年写出的著作。当然，这一年尼采著述颇丰，一气写出了五六本书。所以，他对自己44岁这一年非常满意，甚至认为这一年的日子可以让“生命永世留存了”，没想到一语成谶，之后精神崩溃，再也没有写出东西来。

《瞧，这个人》是哲学家尼采写的一本有关自己生活的书。尼采从1870年开始哲学写作和出版起，长期不受德国读书界重视，还不时遭到非议。直到1888年前后才逐渐获得认可，这使尼采觉得，此时应该是谈谈自己这个人的一个契机。他写作该书时称自己“几乎快要走到生命终点了”，是“快要死的时候了”，而且之后确实精神崩溃直至谢世。

谈论自己人生的书似乎应该是一本传记性著作了，但是，由一位哲学家来写，就写出了与一般传记不同的面貌。如同本雅明的《柏林童年》，尼采不仅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写自己，而且大部分篇幅是关于自己写过的书和其中的思想，即便写自己的生活、家庭等，也明显是以自己书中表达的思想为准绳去选取和整理的。是呵，尼采的成功，他的价值就在他的思想，在他写出的书。所以，《瞧，这个人》完全可以看作是尼采著述和思想的一个入门指南。

全书由四部分组成，即四个“为什么”，其中第三篇“为什么我能写出这么好的书”篇幅最长，按书名简要叙述了自己各本书的情况。当然，都是思想表述，但有故事，有场景，全书都是如此。

有关尼采思想，迄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了数不清的研究和传播。“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意志决定论”“权力意志”等几乎广为人知。但是，尼采为什么那么敌视基督教？为什么那么反对现有的一切价值？他思想的主线与核心到底是什么？这在《瞧，这个人》一书中有简明清晰的表述，那就是看重人作为个体的天赋创造力。由于现有全部价值、基督教信仰都在抑制和抹杀个体天赋的创造力，所以尼采极力反对，勇敢加以摧毁，并认为这是在拯救人类，在开启人类的新命运。他的整个思想都是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的。

尼采看重的人作为个体的天赋创造力，绝不是此前始于康德的德国古典哲学推出的主体性精神，他弘扬的绝不是人作为类的主体精神，而是严格作为个体的主体精神。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和意义无疑是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但只是在形而上学层面谈主体，那不仅没有落实到具体的主体，即个人，还会在类主体的名义下出现对现实主体——即个人的贬抑。正是在此意义上，尼采对德国古典哲学里的形而上学进行了无情鞭挞，他鞭挞的与其说是一种源自古希腊的哲学方法，不如说是这种哲学方法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对个体主体、对个人的贬抑；同样是奉行形而上学方法的17世纪法国哲学却受到了尼采的赞赏。所以，问题不在形而上，而是在人的问题的形而上化。在颓废问题上同样如此，凡抑制个人主创精神的，在尼采看来都是颓废。有时，尼采也称反抗这种抑制为颓废，这是以抑制个体的社会主导价值自诩的说法为参照，如果说你不颓废的话，那我情愿做个颓废者，用颓废来反抗对个体力量的抑制。

在尼采那里，谢林和黑格尔看重的最高层级的存在没有了，有的只是无尽的生成（werden）。但这个生成绝不是西方形而上层面的包罗万象，而只是指向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也不是东方道家的“生生”思想所述的顺其自然的生成，而是要助推的，也就是说，这个“生成”在尼采那里要靠对立面来激发，由每个人的意志力量来激发。所以，尼采更关注的不是这生成本身，而是助推，这是他所关注问题的根本所在。现有一切价值以类和普遍性的名义扼杀了这个助推，所以要摒弃。在汉语世界广为流传的尼采名言“但凡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使你更强大”就是基于这一点。“杀死你”这样的行为只要没成功必定会助推出新的生成，变得更强大。正因为此，尼采在这本书中反复讲自己生活中遭遇的困境，比如疾病、不如人意的生活条件（饮食、居住等）、对母亲和妹妹的不满等等，目的都在阐明不好的遭际可以助推出好的生成。

这又不禁令人想起德国古典哲学中正和反的辩证思想。但在尼采那里，正与反的交互助推，相互激发，丝毫不是在万有的形而上层面去述说的，而是相反，只在形而下层面，并且只是指向个人生活，只限于个人意志范围内，比如，生病可以激发健康意志。但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就不是这样。理想属于观念范畴，意志是个体的、本能的，观念是共体的、反本能的。理想是观念渗入到意志领域的产物，不是个体特有的，不是现实的反面，所以不能激发现实，只体现了类和普遍性对个体现实的抑制和牺牲。基于此，尼采对理想以及理想主义进行了无情批判。在他看来，理想具有形而上特质，不顾现实，无视现实，丝毫不能激发新的现实，反而只能单纯牺牲现实。

尼采与一切现有价值为敌，固然遭到非议。殊不知，他反对的并不是价值本身，而是贬抑个体性、压制个人主创天性的那些价值，这恰是西方思想文化发展到尼采时代的情形。基督教和德国古典哲学才是尼采攻击的目标。所以，就西方思想文化发展史而言，尼采的意义

不单单在于超越形而上学，而在于将主体性精神引领到实实在在的人，落在了一个个具体存在的个人身上，这并不是单纯将主体性精神落到了实处，为个体主创精神提供了保障，还剔除了以类主体名义压抑个体主体的空间，说到底，消除了一部分个体压抑另一部分个体的可能。在此意义上，尼采开启了西方20世纪始的新精神，这个精神从18、19世纪的主体性精神走来，将对类主体的弘扬和信仰变成对现实个体主体的关怀与呵护。因此，尼采著作在其身后，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乃至世界读书界不断受到追捧，这应该昭示出20世纪以来西方和整个世界开始追寻怎样的思想了。尼采早就笃信他的这个思想会引领未来，正是在此意义上，他称自己是命运，代表着人类的命运。

尼采著作的汉译迄今已百年有余，包括《瞧，这个人》在内的各本著作，汉译本可谓数不胜数。翻阅这些译本，原作的表达或多或少基本都能传译出来。但是，对照原文，总能发现不少没有传译清楚或是传译有误的地方，不是在句式上太拘泥于原文，词义上太脱离语境，以致紧密嵌入上下文的实际含义没有准确译出，就是在没有捕捉到实际含义的情况下，按照目标语逻辑进行发挥，如此，往往表面上语句通顺，实际则缺乏思路本身内蕴的前后逻辑，结果离原义相距甚远，甚至不乏歪曲、颠倒。这对我们不断章取义、不肢解，准确全面理解尼采，不无遗憾。

当然，学术翻译，尤其是人文学术翻译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本着这样的精神以及对尼采的敬重，经过一番犹豫后，我最终还是接受了在出版业界享有盛名的果麦文化的邀请，重译尼采的《瞧，这个人》。不敢说目前这个译本会是该书最好的汉译，但至少纠正现有译本的不少偏误，为靠谱译本的出现做出一份贡献。

本书据德国莱比锡阿尔弗雷德·克罗纳出版社（Alfred Kröner Verlag）《尼采遗作集》（*Nachgelassene Werke von Friedrich*

Nietzsche) 一书1922年第3版中的《瞧，这个人》译出，译本中的注均为译注。原文中如引拉丁文，译文中照录，并加括号注明汉义。

译者于2020年春
时逢举国上下抗击“新冠”之际

瞧，这个人

——如何成为本来的你

1908

序言

1

由于我准备不久后对人性做出迄今为止最严峻的考量，所以有必要先说一下：我是谁。其实，人们对此应该已经有所知了，因为我已经说过和写过不少东西。可是，人们没有听到，甚至连看也没有看到。这表明，我的宏大使命与我同时代人之间有着不少间距。我全靠我的自信活着。说这话也许不太对吧，我活着吗？……我只需要与任何一位夏天到上恩加丁^[1]来的“有文化的人”交谈一下就会明白，我并没有活着……目睹这样的情况，虽然我的习惯和高傲的天性不允许，但我还是要高喊：好好听我说什么吧！因为我是一个特别而又特别的人，先不要把我搞混了啊！

2

具体来说，我绝对不是稀奇古怪之人，不是道德狂徒，我甚至是与那些迄今被尊奉为有德之人完全相反的人。低声说给你听，这正是我引以为傲之处。我是哲学家狄奥尼索斯^[2]的信徒，我不想把自己说成是什么圣人，而宁可说成是萨蒂尔^[3]这样的人。读一下这本书吧！也许在这本书里我成功做到了，以一种轻快宜人的方式说清楚了与有德之人完全相反指的是什么。这本书的意义或许在此。

我要许诺去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改善”人类。我没有建立任何新偶像，只愿旧偶像能明白，拥有泥塑的双腿意味着什么。我要做的事毋宁说是抛开偶像（我用这个词指的是“理想”）。当人们构想出一个理想世界时，这就剥去了现实世界的价值、意义和真实性。“真实世界”和“表面世界”——用日常德语来说就是构想出的世界和现实。……迄今为止，理想这个骗人的东西就是对现实的诅咒，而人自己正是由此在本能最深处蜕化变质，变得虚假，甚至发展到膜拜那些相反价值的地步，也就是膜拜那些与确保人类成长、未来和走向未来之高尚权力的价值完全背道而驰的东西。

3

凡知道如何呼吸我著作气息的人都知道，那是高空之气，令人清新之气。人必须对之适应，否则置身其中很有可能会有受寒的危险。四周都是冰雪，放眼望去，无比孤零。但是，万物在阳光照耀下是多么宁静和安然！人的呼吸是多么自由！人的感受是多么丰富呵！正如我了解和经历过的那样，从事哲学就是心甘情愿生活在冰雪之中，高山之上。——哲学就是探寻现实生活中未知的和尚未认可的一切，探寻道德迄今所禁锢的一切。我长期在这样的禁地探寻，由此我发现，迄今那些道德化和理想化的做法，其缘由并不是通常所说的那样，我发现了哲学家们的隐秘历史，发现了他们沽名钓誉的心理机制。一个人的思想中承载了多少真理？又敢于正视多少真理？这一点越来越成为我进行价值评判的真正标准。出错（——对理想的信仰——）不是源于没有看清情况，而是源于怯懦。……认知方面的每一项成就，每一次进步都来自勇气，来自无情和精准地推翻自己……我并不抵制理想，我只是戴上手套使自己免受它的伤害而已……*Nititur in vetitum*（我们追求被禁锢的东西）[\[4\]](#)。以此方式行事，我的哲学终将获胜，因为迄今为止遭禁锢的基本上只是真理。

在我的著作中，《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地位独特，这本书是我送给人类最大的一份厚礼，如此这般的著作前所未有。这本书拥有着穿越千年的响声，不仅仅是迄今最为高亮的著作，真正含有高山气息的著作，无限遥远地超越全部人，而且这本书还是一本最有深度的著作，它从真理宝藏的最深处诞生，是一口取之不尽的宝贵水井，没有一只吊桶放下后不是满载金银上来的。在书中说话的不是一位“先知预言者”，不是人们称为宗教奠基者的那种可怕的、集病态与权力意志于一身的人。为了避免可怜兮兮地误解说话者呈现之智慧的意义，就尤其要好好去倾听书中说话者的语调，也就是那种平静语调。“激起风暴的言语最为宁静，引领世界的思想借用鸽子的脚丫悄然而至——” [5]

无花果从树上落下，又好又甜，那是因为它们落下时，红色的表皮开裂了。我是正吹来的一阵北风，吹熟了无花果。

这里的教言像无花果一样朝着你们落下，我的朋友们，请享用它的果汁，品尝它甘甜的果肉吧！四周一片秋色，澄明的天空和午后——[6]

这不是一个狂徒在说话，不是在“布道”，也不要求信仰什么。一点一滴，一字一句，从无尽的欢愉和深度幸福中流溢而出，语速舒缓而轻柔。这样的话语只会沁入那些被选中的人的心头，能在这里成为听众，是一种无上的特权。查拉图斯特拉的话语不是谁想听就能听的……由此看来，难道查拉图斯特拉不是一位引诱者吗？……可是，在查拉图斯特拉第一次抽身离去要重回独处时，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的正是与那些“智者”“圣徒”“救世主”和其他颓废者[7]

在这情况下会说的完全相反的话……不仅说的话不同，而且他就是一个不同的人……

现在我独自离去，我的弟子们！你们也走吧，而且独自离去，我要你们这样。

远离我，保护好自己，不要让查拉图斯特拉渗入！最好是为他而羞耻！也许他骗了你们。

追求知识之人不仅要爱他的敌人，也要能恨他的朋友。

一个人如果总是当学生，这不是对老师的一个好报答。你们为什么不想扯掉我的花环呢？

你们崇敬我，但是一旦这个崇敬哪天倒掉了，那该怎么办呢？保护好你们自己不要让倒下的雕像砸到了呵！

你们说你们信奉查拉图斯特拉？可是，查拉图斯特拉算什么呵！你们说你们是我的信徒，可是，全部信徒又算什么呵！

你们还没有找寻就说发现了我，一切信徒都是这样。所以，凡信仰都是一文不值的。

现在我要你们丢开我去寻找自己，等你们每个人都否定我时，我才会愿意再回到你们身边……

弗里德里希·尼采

* * *

在这美好的一天，万物成熟，不仅葡萄变成紫色，一缕阳光也照进了我的生命。我向前望去，向后望去，从没有一下子看到过这么多、这么美好的事物。今天我送走了我的第44个年头，不是一无所

获，我是可以送走这一年的。这一年里，生命的意义得到拯救，生命可以永世留存了。《重估一切价值》《狄奥尼索斯颂歌》以及放松时写的《偶像的黄昏》，都是这一年给我的馈赠，具体说，是这一年最后三个月的馈赠！我怎能不对我整个生命心怀感恩呢？所以，我要讲述我的人生。

[1] 上恩加丁 (Oberengadin)，瑞士东南部阿尔卑斯山区一地名，1879到1888年，尼采都会到这里避暑。

[2] 狄奥尼索斯 (Dionysus)，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自出道作《悲剧的诞生》开始，“狄奥尼索斯”这个形象在尼采思想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

[3] 萨蒂尔 (Satyr)，希腊神话里的森林之神，半人半羊，嬉戏成性，经常陪伴在酒神狄奥尼索斯身边。

[4] 出自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爱经》 (*Amores*)，第三卷，第五章，第17行。

[5]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寂静的时刻》。

[6]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在幸福岛上》。

[7] 颓废者 (décadent)，尼采晚期哲学中的重要概念。

一 为什么我如此有智慧

1

我这一生的福祉来自不幸遭遇，或许我这一生的独特之处也在此：用一种打谜方式来说，作为俺爹的我已经死去，作为俺娘的我还活着且渐渐变老。这双重根源分别代表生命阶梯的最高一级和最低一级，也代表没落和新生。不管怎样，这总能表明我身上的那种中性状态，那种对人生全部难题的哪一方都不偏不倚的自由状态。这使我出类拔萃，我对上升和下落的征兆比任何人都要敏感，对此非常在行。我熟知这两方面，我自己就是它们。

我父亲在36岁时就去世了^[8]：他文弱，可亲，且多病。就像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匆匆过客，与其说他是一个生命，不如说是一个对生命的善意回忆。与我父亲生命衰老的年龄相仿，在那同一个年岁，我的生命也开始衰老。36岁时，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我仍然活着，但是看不清离我三步以外的地方。那时候（1879年）我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务，整个夏天就像幽灵一样生活在圣摩里茨，第二年冬天则是我一生中最暗无天日的冬天，这个冬天我又像幽灵那样在瑙姆堡^[9]度过。那是我生命的最低潮，《漫游者及其影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无疑，那时我就把自己看作幽灵……

第二年冬天，也就是我住在热那亚的第一个冬天，几乎伴随着极度贫血和虚弱出现了超脱和愉快，这种愉快和超脱带来了《朝霞》这部作品。这部书体现出完全的明朗、愉悦乃至旺盛的精神，它不但与

我身体上的极度虚弱同步，甚至与肌体的极度疼痛也同步。我连续三天三夜备受头痛和咳痰艰辛的折磨，与此同时，我头脑却如辩证家一般清醒，对事情可以进行冷静透彻的思考，而在健康时，我对这些事情的思考反而没有进展，不够敏锐和冷静。我的读者或许知道，我是如何将辩证法看作是颓废的表征，比如苏格拉底就是最著名的例子。理智错乱，甚至那种发烧后出现的半昏迷状态，在我这里还未出现过，要想知道它们的性质和出现频率，还得查阅一下。

我的血液流得很慢，从来没有人能在我身上找出发烧的原因。有位医生很长时间把我当成精神病人来医治，最后他说：“不！您的精神没有问题，是我自己有点神经质。”虽然由于全身乏力我的消化系统极度虚弱，可是没人能查出我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了毛病，也查不出胃有什么器质性病变。我的眼病也是如此，甚至有时还被诊断出有濒临失明的危险。但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此，我的视力是随着生命力的一步一步增强而变好的。对我而言，漫长的，过于漫长的岁月就意味着痊愈。遗憾的是，这些岁月里也会出现复发、衰竭以及颓废期。

这么多事清楚表明，在颓废问题上我是一个有经历的人，我已经反反复复经历多遍。就连那种把握与理喻的精湛技艺，对细微差异的锐敏，明察秋毫的本领以及一切我身上独有的东西，都是那时学会的，都是那时给我的真正馈赠，那是一段令我变得洞悉世界的时光，不仅观察本身，而且观察所凭借的器官，都变得异常锐敏。从病者视角出发去审视健康和价值问题，又反过来从踌躇满志人生得意者的视角去探视颓废本能的隐秘活动，这是我做得最多的训练，也是我的真正经历所在。如果说有什么造化的话，那就是我在这方面成了大师。如今，我对此已驾轻就熟，我能够变换视角看世界。为什么这世上唯有我可以去重估价值，这就是首要原因吧。

我除了是个颓废的人以外，还是个与其相对立的人。这方面的例证也有好多，比如在出现严重健康问题时，我总是本能地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法，而颓废者却总是选择最终不利于治愈的方法。总体来说，我是健康的，就局部和特色而言，我才是颓废的。甘于绝对的寂寞，摆脱习惯做法，强迫自己不再被照料，拒不就医，这些都表明，在遇到情况时我可以本能地绝对断定，什么是问题的关键。我会自己介入，自己来治愈自己。当然，这么做的前提条件是，这个人实际并没有生病。这个前提是每位生理学家都会指出的。

一个典型病态的人不可能不生病，至于自我痊愈的可能性则更小；相反，对一个典型健康的人来说，患病甚至可以反过来成为生命的有力助推剂，使其变得丰盈。我的那个漫长患病时期在我现在看来就的确如此：我近乎重新发现了生命，也重新发现了自我。对于所有美好事物，不管如何微小，哪怕小到他人无法轻易察觉，我都能品味其妙。我从自己谋求健康和生命的意志中创造了我的哲学……因为人们应该注意到：在我身体最差的那几年，我不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了。自我恢复的本能禁止我创立一种困顿且让人气馁的哲学……那么，人们到底凭什么去识别一位健康之人呢？接触健康之人我们的感官会感到愉悦，这样的人由一块奇木铸成，那木料虽坚硬但不失柔和，还散发出宜人的香味。这样的人觉得可口的唯有对健康有益的东西，超出这个尺度，他的喜悦和欲望都会停止。他洞察了抵御病患的良方，他会将糟糕之事运作成好事，但凡不能杀死他的东西，最终都会使他变得更强大。他本能地从自己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一切中收集养料：他在有舍有弃地择取。无论在看书，与人交往或观赏景物，他都在进行这样的收取：他推崇自己择取、认可和信任的一切。对各种刺激，他反应迟缓，这种迟缓是他长期的谨慎和有意的傲慢所致。他会审视面临的刺激，不会简单迎上去。他既不信“厄运”，也不信

“过失”。他了解自己，也对付得了别人，他能做到忘却，他还足够坚强，强到可以使一切东西都变成对他而言的好事。请看，我是一个与颓废者恰好相反的人，因为我能说清自己。

3

我父亲曾在阿尔滕堡宫生活若干年，后面那几年他当上了传教士，他给农民传教。聆听过他传教的农民说，他看上去简直是天使。拥有这样一位父亲，我认为是老天莫大的恩赐，这触及了血统问题。我拥有纯正的波兰贵族血统，血统里没掺和一滴不良的血，至少没有德国人的血。如果要寻找我最深层的对立面，即那种无法估量的使坏本能，我总是发现我母亲和妹妹，与这等暴民有亲属关系简直是对我神性的亵渎。母亲和妹妹那副待我的样子，至今都令我毛骨悚然。她们宛如一台令人恐惧的完美机器，高度精准，可以准确无误地捕捉到令我血淋淋受伤的时间点，——都是在紧要关头——，因为那时人是没有任何力量去抵御有毒害虫的……一起相处就使这样一种先定的不和谐成为可能……但我得承认，对我真正深邃的“永恒轮回”思想提出最深刻异议的，总是我母亲和妹妹。

不过，就作为波兰人而言，我身上也出现了难以置信的返祖现象。人们也许得后退几百年，才能在芸芸众生中真正地找到我所描述的这世上存在过的最高贵种族。跟如今全部所谓高贵的东西相比，我有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尊贵感，即便碰上那位年轻德国皇帝^[10]也不会赐予他当我马车夫的荣誉。我承认，能与我相提并论的只有一位——我是带着至深谢忱承认这一点的。科西玛·瓦格纳太太绝对是最高贵的人。为了避免有所疏漏，我还得说，理查德·瓦格纳是与我非常有亲缘关系的人……其余的就不说了……所有流行的有关亲缘程度的说法都是一种生理学上的无稽之谈，罗马教皇如今还在兜售这种荒谬的

东西。人至少与自己的父母是有亲缘关系的，而与自己父母有亲缘，应该是在共性问题最肤浅的东西了。高贵之人都有无限深远的渊源，他们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凝聚、积淀和练就而成的。伟大的个体乃是最古老的存在，不管我是否搞得明白，尤利乌斯·凯撒就有可能我的父亲——或者亚历山大，这位狄奥尼索斯的化身……此时此刻，正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邮递员给我送来了一份上面印有狄奥尼索斯头像的邮件……

4

我是一个不太会招来别人敌意的人，即便在我看来这样很有意义，但还是做不到。这要感谢我那无与伦比的父亲，引起别人对我有敌意这样的事在我这里甚至一次都没有过，无论如何这应该是与基督徒不相匹配的。综观我的一生你会发现，除了那一次，你在其中发现不了任何踪迹可以表明有人曾对我心怀恶意。相反，你或许会发现，有太多的人对我怀有善意……我的经历毫无例外地告诉我，即使与那些难以打交道的人相处，我也能获得正面的经验。我可以驯服每一头熊，可以让小丑也变得庄重。我在巴塞尔大学教授高年级希腊文的七年中，从未出现惩罚学生的必要；在我这儿，连最懒惰的学生也变得用功。对于意外事件，我总是能应对自如；为了做到遇事镇定自若，我头脑里不会预先设定什么框架。不管是什么乐器，也不管它是多么不和谐，比如，“人”这种不和谐的乐器，如果我不能用它弹点动听的乐曲，那我肯定是生病了。我不知多少次听这些“乐器”在讲述，它们自己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弹奏……这方面最美妙的例子或许是那位不幸英年早逝的海因里希·冯·施泰因了。有一次，他在谨慎地得到许可后，在西尔斯-玛利亚待了三天。他对所有人都说，他不是为恩加丁山而来的。这个优秀的年轻人，以一位普鲁士容克贵族全部强烈的单纯和天真，深入到了瓦格纳（还有杜林！）的泥潭中。在这

三天中，他就像受到了一场自由风暴的改造，就像一个人骤然长了翅膀，突然升上他的高空。当时我告诉他，这是高山上的好空气带来的，人人都有这样受到改造的感觉。要不然，跑到这高于拜罗伊特^[11]6000尺的地方来就没意义了。但是，他不愿意相信我的话……

如果说有人不管怎样对我做了一些大大小小不好的事的话，那原因不在故意，至少不是出于恶意。正如我曾暗示过的那样，要抱怨的话不如去抱怨那给我生活造成不小麻烦的善意。我的经验让我有理由去怀疑有所谓“忘我”冲动，去怀疑全部乐于助人的“博爱”。这种“博爱”在我看来本身就是一种虚弱，意味着无能抵御外来刺激。——同情只在颓废者那里才意味着美德。我讨厌有同情心的人，他们会轻易失去羞耻感、尊严感以及对人间差距的细腻感知；同情一转眼就会散发出下等人的气息并且看上去与粗俗之人举止相似。——特定情况下，有同情心的人还会陷入一种灾难性的命运，陷入饱受创伤的孤独，拥有超出常人的重大过失感。克服同情心在我看来是一种高贵的品性：在《查拉图斯特拉的诱惑》中，我虚构了这样一个事例，当查拉图斯特拉听到一声尖锐的呼救声时，同情心就像刚刚犯下的罪过一样袭上心头，想使他背离自我。此时要把持住自己，把持住自己那崇高的使命，不受只顾眼下要采取所谓无私行动之低级冲动的的影响。这就是查拉图斯特拉要经受的考验，也许是最后的考验——这是对他力量的真正证明……

5

还有一点令我跟父亲像极了，使我简直就成了他英年早逝生命的延续。世上没有人是完全与他人对等地活着的，而且“报复”这个概念就像“权利对等”概念一样是没有人能做到的。与此对应，当有人对我做出大大小小的蠢事时，我不会采取任何反击和保护措施。——

这样做是多么幼稚，所有辩解和“托辞”也都是如此。我的报复方式是，尽可能快地给蠢行回以明智举措。这样，兴许还有可能战胜它。打个比方来说，为了摆脱酸味，我会送去一罐果酱……只要有人对我做了不好的事，我会“报复”回去的，这一点肯定无疑。不久我会找个机会向“干坏事的人”表示感谢（甚至会对那干的坏事表示感谢），又或者向他请求点什么，这可能比给回点什么更能让人上心……还有，我觉得，再粗鲁的话语，再粗俗的文字都要比没有任何反应的沉默来得好和敦实。那些沉默者差不多总是缺乏对心灵的细察和恭敬；沉默就是一种缺陷，忍气吞声必然会弄出一种不良习性，——甚至会损坏肠胃。所有忍气吞声的沉默者都是消化不良的人——人们可以看到，我没有贬低粗野的意思，它绝对是最合人性的反抗方式。在当今这个正转向柔弱性情的社会中，粗野恰是人首要品性之一。人若足够粗野，即便做不正当的事也会有有一种幸福感。神降临人间会做的无非就是不正当的事，——不是承受惩罚，而是敢于犯有过失，方才堪称神性。

6

摆脱怨恨^[12]，弄清怨恨——有谁知道即便在这方面，我也是多么感谢我那长时间的生病啊。但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人必须从力量和虚弱出发，有了亲身经历才会明白这一点。如果你不管基于什么考虑认为生病和虚弱是一件坏事的话，那么，你就会失去身上原有的自我痊愈本能，这是人身上的抵御和防卫本能。这样你就什么都摆脱不了，什么都无法对付，什么也不可能加以拒斥，所有一切都会伤害到你。物侵入人，体验太刻骨铭心，记忆成了一道化脓的伤口。

生病本身就是一种怨恨。对此，生病者只有一个有效手段来对付——这手段我称之为俄罗斯式的宿命论，那种毫无反抗的宿命论。一

位俄国士兵觉得疆场厮杀太残酷，最后就怀着这种宿命论想法躺在了雪地里。对外界发生的一切不再接受，不再吸取，不再让外界沁入自身——对外界不再有任何反应……这宿命论并非只是有着随时赴死的勇气，而且其重大意义在于，在生命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保命手段。这是在降低新陈代谢，而新陈代谢的减缓是一种要冬眠的意志。按照这个逻辑再往前走几步就变成苦行僧了，苦行僧可以在墓穴里躺上几周的时间……由于人遇事立刻有反应，便会过快耗尽能量，因此索性停止做出反应：这就是那个逻辑。

怨恨这种反应是最快速耗尽你精力的东西。愤怒烦恼，过度敏感，无力报复而又强烈渴望报复，各种各样的有害情绪混杂在一起——对业已精疲力竭者来说，这无疑是最为糟糕的反应了：它会迅速耗尽你神经的力量，加快释放有害分泌物，比如胆汁流入胃中。对于生病者而言，怨恨是绝对要禁止的——怨恨是病者的恶魔。不幸的是，怨恨也是病者最自然的倾向——那位深谙生理之道的佛陀掌握了这一点，他的“宗教”我们最好称之为“养生学”，以便与基督教这种无力的东西区分开来。这种“宗教”的意义就在于对怨恨的战胜：使心灵从怨恨中解脱出来——此乃走向康复的第一步。“敌意无以止息敌意，唯友善才能止息敌意。”^[13]佛教教义一上来就这么说——这不是什么道德主张，而是生理学意义的主张。怨恨产自虚弱，而受害最大的莫过于虚弱者本人。要走向另一种情形，前提是人要状态良好，对这样的人而言，怨恨就成了一种多余的东西，这是一种能始终驾驭住怨恨的感觉，这差不多表明此人状态良好。

我的哲学是在与复仇和怨恨情绪作当真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深入到“自由意志论”中——与基督教的斗争只是其中的一个个案而已。那些了解这种严肃态度的人会明白，为什么我要特别在此表明我个人的态度，表明我在实践中拥有的本能的自信。在我颓废的那段时间里，我不允许自己出现这些有害的情绪。在我的生命又变得健康和

恢复自豪时，我还是立刻抑制住这些情绪在我身上出现。上面提到过的“俄罗斯式的宿命论”是这样出现在我身上的，对于那些几乎难以忍受的处境、地点、住所和人群，只要它们偶尔出现之后，我都会数年之久地驻守其中——这胜于改变它们，也比感觉到它们是可改变的要好——胜于对它们的反抗……在那些日子里，要是有人妨碍我奉行这种宿命论，试图粗暴地唤醒我，我都会极其生气——说实话，每次这样都十分危险。——把自己看作一种天命，而不愿意看成“别样的”，这就是伟大的理性本身了。

7

还有一件事就是战斗，我生性好斗，攻击乃是我的本能之一。能与人为敌就去与人为敌——这也许是以某种坚强天性为前提的，无论如何，坚强的天性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凡坚强的天性都需要有对抗力，因此他们都会去寻求对抗。正如复仇和怨恨情绪必然属于弱者一样，好斗的激情则必然属于强者。举例来说，女人的报复欲是很强的，这是由她们的弱势所决定的，她们对他人的困苦有着较强的敏感也是同样的道理。攻击者需要对手，他的强大就是由对手来衡量，只有找到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才能提升起他的力量，或者就哲学家而言问题也是如此，因为一个好战的哲学家也要向难题发起挑战，与之决斗。哲学家的使命不在于战胜单纯的抗力，而在于战胜那些用灵活的韧性和超凡的武艺竭尽全力与之决斗的抗力，也就是说战胜旗鼓相当对手……

与对手旗鼓相当，这是公正决斗的首要条件。如果你轻视对手，那就不能开战；如果你在命令对方，自恃高于对方，那也不能开战。——我的战斗实践可以总结出四条原则：第一，我只攻击那些从未败过的对手，——我会等到对手进入屡战屡胜状态时才进行攻击。第

二，我只在没有援手可依赖而必须独自应对时才会出手，也就是说，只有在孤自一人处于劣势时才会出手……不处于劣势我是从不会公然出手的，这是我的公正行为准则所在。第三，我从不进行人身攻击。我只是把人当成一个高效放大镜，用它来看清某种不显眼，但正暗暗滋生且难以把握的不良状态。我就是这样去抨击大卫·施特劳斯的[14]，准确地说，我攻击的是德国“教化”方面一部老朽的成功之作，——是我真正击中了这种教化……我也这样抨击过瓦格纳[15]，确切地说我攻击的是我们“文化”的虚伪，我们文化天生的混杂，它将精巧者与富有者，迟暮者与伟大者混为一谈。第四，但凡不去关注个人之间差异，忽视不良事件发生之背景的东西我都会去攻击。相反，攻击在我这里表明的乃是善意，在特定情况下还表示着谢忱。我通过将自己的名字与某事，某人的名字连在一起，来表达我对它们的尊重和嘉奖，至于赞同还是反对——在我这里无关紧要。如果我去攻击基督教，那也是我应该这样做的，因为我还没有遭受过任何来自基督教的迫害和不幸，——虔诚的基督徒对我总是友善的。我本人却绝对是基督教的一名反对者，我不会赞同，将千百年来不幸之事加到某个人身上。

8

我还可以大胆指出我天性中的最后一个特征么？这给我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带来的麻烦不小。对于纯净度我拥有一种无比完善的本能性敏感，因此我能从生理意义上感知到——嗅到——每个心灵的切近之物，或者说每个心灵最内在的东西，即每个心灵的“内脏”……就这种敏感而言我拥有生理触角，凭这触角我可以触摸和察觉到一切秘密：人有许多基于某些天性的污垢，也或许来自不良血统，但由于教育会掩饰起来，对此我几乎只要一接触就会有所觉察。假如我的观察正常发挥的话可以看到，那些无法忍受我对纯净敏感的

人在看到我的厌恶后也会变得谨慎小心点，但这不会使他们变得好闻一些……就像我习以为常的那样，我活着的前提就是对自己有一种极端的洁癖，不洁净会令我丧命的，——可以说我不断在水中，在某种完全透彻和光亮的元素中游泳、沐浴和嬉戏。在我与别人相处时，这种洁癖要求变成了对我耐性的一个较大考验，我身上的人性并不体现在对他人能做到感同身受，而在于能够忍受这种感同身受……我身上的人性就体现在不断地自我超越。但是，我需要孤独，也就是说，我需要康复，回归自我，需要呼吸一种自由轻松活泼的空气……我的整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一首赞美孤独的酒神颂歌，或者读懂了这部书的话，就是一首赞美洁净的酒神赞歌……幸好赞颂的不是单纯的愚钝。对色彩敏锐的人会把查拉图斯特拉称作一颗金刚石。对人的厌恶，对“恶棍”的厌恶，向来是我最大的危险……你们想听查拉图斯特拉说的那些摆脱厌恶的话吗？

我到底遭遇了什么？我如何才能摆脱厌恶？谁能让我的眼睛重新变得锐敏？我如何才能飞到高处？那里再也没有坐在井边的恶棍。

我的厌恶感替我创造了双翅和洞察源泉的力量吗？是的，那最高的高处是我要飞往的地方，那里才能重新找到欢乐的源泉。

呵，兄弟们，我找到那欢乐源泉了。在这最高处，欢乐的源泉向我沸涌，这里的生活是没有恶棍环伺左右共饮这泉水的。

欢乐之泉，你几乎太猛烈地向我涌来！不断饮完一杯又把杯子盛得满满！

我还必须学会克制一点接近你：我的心太过激烈地向你冲去！

我的夏日在心上燃烧，就是那短暂、炎热、忧郁和极度快乐的夏日：这颗夏日之心多么渴望你的清凉啊！

我那春天踌躇的忧郁过去了！我那六月雪花的恶毒离开了！
我已经完全成了夏天，进入了盛夏！

一个高山之巅的夏天，有着清凉透骨的泉水和令人愉悦的宁静。呵，来这里吧朋友们！你们的到来会使这里的宁静变得更加愉悦！

由于这里就是我们所处的高空，我们的家园，对所有不洁者和他们的渴望而言，我们这个居处太高，太陡峭了。

只管把你们纯洁的目光投向我这欢乐的源泉吧，我的朋友们！它怎会因此变得浑浊呢？这源泉会以它的纯洁笑迎你们！

我们在未来这棵树上构筑我们的巢穴，苍鹰用自己的喙为我们这些孤独的人送来食物！

是的，没有食物可以与那些不洁者一同分享！即便吃了他们也会觉得是在吞食火焰，烧了自己的嘴巴！

是的，我们不会在这里给那些不洁者提供居所！任由他们的躯体和思想在冰窟里冻僵就是我们的幸福！

我们要像疾风一般，高高地生活在他们上方，与苍鹰为邻，与风雪为伍，与太阳为伴：疾风就是这样生活的。

总有一天，我会像风一样吹到他们中间，用我的精神使他们的精神窒息：这正是我未来想做的事。

的确，对所有低微者来说，查拉图斯特拉就是一阵飓风：他对自己的敌人和所有会唾吐者奉劝道：当心啊，不要迎着风唾吐！……[\[16\]](#)

[\[8\]](#)尼采尚未满5岁时（即1849年），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9\]](#)瑙姆堡（Naumburg），德国黑森州一城市。

[\[10\]](#)指威廉二世，他29岁时从父亲弗里德里希三世那里继承皇位成为德国皇帝。

[11]拜罗伊特（Bayreuth），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瓦格纳从1872年直至1883年去世都居住在这里，因此尼采在此用“拜罗伊特”来指称瓦格纳。

[12]“怨恨”（Ressentiment）是尼采后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道德的谱系》有集中阐释。

[13]此处佛陀经句原文应为“从非怨止怨，唯以忍止然”，出自《南传法句经·双品》。尼采根据德译引用，德译做了归化处理，从原文有所偏移，但恰好契合尼采此处想要表达之意：用对立面来激发改变。故此处依尼采转述德译之意译出。

[14]指《不合时宜的考察》中的《大卫·施特劳斯：自白者与作家》一文。

[15]特别指《瓦格纳事件》（1888年）。

[16]《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贱民》，略有修改。

二 为什么我如此聪明

1

为什么我知道的就是比别人多？究竟为什么我如此聪明？因为我思考的东西从来都是值得所思的，浪费精力的事我从不会去做，比如，我从来不去体验宗教方面令人纠结的事。

“原罪”的感觉我就从没有体验过，我想，为何我就得是个“有罪的人”呢？同样，对于什么是良心谴责，在我看来，至今也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对此一些盛行的说法丝毫没有意义。我不想事后对一个行为进行责难，宁可将不尽如人意的结果与价值考量彻底分开，对于一切行为的结果都要这样。面对不尽如人意的结果，人很难正确地看待自己做过的的事，因此，内疚感的说法在我看来本身就“用意不良”。我的道德原则宁可是，对于已经受挫的事尤其要去关爱，因为它已经受挫了。

“上帝”“灵魂不朽”“拯救”“来世”，这些东西纯属概念，从孩提时代起我就从未重视过，也没在上面花过时间。这是否表明那时我还不够孩子气？否则不会对这些概念不予关注。我亲近无神论，绝不是由于看了什么，更不是由于经历了什么，而是一件基于本能的自然而然的事。我过于好奇，太会质疑，又胆大无比，因此，对事物做粗浅解答不会让我满意。上帝就是对世界给出的一个粗浅答案，对我们思考的人而言，是清汤寡水，引不起食欲。

从根本上看，上帝不是别的，只是对我们发出的一道粗暴禁令：你们不要思考……我更感兴趣的东西完全与此不同，那关乎的不是什么神学奇迹，而是“救赎人类”：喂养问题。对此信手拈来的表述是，“为了使力量最大化，为了达到文艺复兴式的德性，为了拥有那种摆脱道德说教的理想德行，你应该怎样喂养自己呢？”

这方面我的经历真是糟糕之极，令我感到惊讶，居然这么晚才触及这样的提问，这么晚才从这糟糕的经历中学到了“理性”。唯有我们那全无价值的德国教育所教授的“理想主义”，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我恰是在这方面落后到极点。

这种“教育”从一开始就让我们忽视现实，去追求绝对有问题的、所谓的理想目标，比如“古典文化”——仿佛把“古典”和“德国”这两个原本不相干的词强扭到一个概念中。还有更滑稽的，试想一下，一个“有古典教养的”莱比锡人，这听上去多么可笑。

事实上，我在长大成人之前一直吃得很差，用带有道德意味的话来说，为了不麻烦厨师和殃祸其他基督同仁，我在吃方面是“无我的”“大公无私的”“不强调个人的”。例如，莱比锡的烹调和我早年对叔本华的研读（1865年）非常严重地令我失去了“生命意志”。要使一个人变得营养不良并伤害其胃，在我看来莫过于莱比锡的烹调了（据说1866年有所变化）。但是，德国烹调本身，比如餐前喝汤（早在16世纪威尼斯食谱中就称之为来自德国厨艺），还有煮到不能再煮的肉，加肥肉和面粉混煮的蔬菜，面包变成了硬硬的块儿完全可以用作镇纸了。德国烹调的良知究竟何在啊！

此外，古代德国人还有饭后狂饮的习惯，今天的德国人也绝对如此，这样就会明白德国精神来自何处了——来自忍辱负重的肠胃……德国精神就是消化不良的产物，它消化不了任何东西而不断在纠结。但是，即便英国饮食，也是我身体不适应的。与德国甚至法国相比，

英国饮食已经算得上是一种“回归自然”，也就是回归原始吃法了。在我看来，这种吃法令精神步履艰难，就像英国女人那样带着沉重的步履……最好的厨艺在皮埃蒙特。[\[17\]](#)

饮酒是我的短板，一天只要喝上一杯葡萄酒或啤酒就足以令我迷糊，而生活在慕尼黑的人与我相反，他们很会喝酒。这一点我虽然较晚才明白，但从孩提时起我就已经有喝酒方面的经历了。小时候我曾以为，喝酒和抽烟起初只是青年男性的虚荣心，后来才变成坏习惯。这个看法有点酸涩，导致这一看法的或许是瑙姆堡的葡萄酒。基督徒认为酒会使人兴奋，而我不是。我想说，对我而言这是胡扯。奇怪的是，现在的我只要喝一小杯酒，而且是明显稀释过的，就会有些头晕目眩，如果喝的是烈酒，我就几乎成了水手，口齿不清，步态蹒跚。而小时候的我在饮酒方面却没有这样脆弱，记得有一次深夜用拉丁文在写一篇长长的文章，心怀抱负要在行文的严谨和简练方面酷似我的偶像撒路斯提乌斯[\[18\]](#)，写作中还做了效仿。当时我就喝了几口最厉害的那种朗姆烈酒，身体绝对没有不适，也许撒路斯提乌斯的身体也能适应这样的烈酒。那时我还是名校普福塔中学的学生，这倒与该校的名望没什么不相称……

后来接近中年，理查德·瓦格纳使我发生了变化。我作为一名反素食的实践者，完全如瓦格纳，虽然自知无力劝说所有更具灵性的人完全戒酒，但自己毫不犹豫地开始严格拒绝任何“精神”饮料。水能实现与酒一样的功效。我开始喜欢喝水……尤其喜欢直接喝涌动的泉水。凡是可以直接喝泉水的地方我都喜欢，比如尼斯、都灵、西尔斯，我会像狗一样去追寻一小杯水。

人们说，*In Vino Veritas*（酒后吐真言），看来，我在真理问题上又与大家不同了。在我这里，精神悠荡在水一方……我的几个做法可以有所提示。饱餐要比只吃一点点更易消化，消化良好的首要条件

是整个胃都工作，人必须了解自己的胃有多大。出于同样的道理奉劝大家避免耗时的饭菜，我指的是吃吃停停的饭局，比如豪华宴请时就这样。餐与餐之间不要再进食，咖啡也不要喝，咖啡会使人忧郁。茶只有早上喝才有益处，而且要喝浓茶，量要少，如果浓度稍许不到位，喝茶就没好处，会令人整天萎靡不振。这方面固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标准，但差别往往微乎其微。如果遇到使人烦躁不安的气候，那就晨起不宜马上喝茶，而是要先喝一杯浓浓的脱脂可可，一小时后再喝茶。还有，尽量少坐，不要以为在户外和放松行走时就诞生不了思想。要是这样以为，连你的筋骨也不会为之高兴。所有偏见都与身体状态有关，我曾说过，久坐不动是违背圣灵的一种真正罪过。

2

与营养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居住地和气候问题。没有人能自由地四处生活，凡是想干一番大事而且要为此竭尽全力的人，在这方面没有多少选择余地。气候对新陈代谢的影响十分显著，会减缓也会加速。因此，选错居住地和气候环境不仅会使人无以完成原本想要干的事，甚至还会使人远离原本要干的事：根本看不清原本要干的是什么。选错了居住地和气候环境的话，人就根本获取不了足够的动物性活力，因此也就做不到自由地遁入精神生活中去，进而意识不到：这事我一个人能行……内脏的些许迟缓只要成了糟糕的惯常之事，就足以使天才沦为庸才，沦为“德国式”的存在。单凭德国的气候就足以削弱强大甚至英武的内脏功能。

新陈代谢的速度与精神脚步的灵活或迟钝密切相关，而精神本身其实就是新陈代谢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罗列出卓有才智的人现在或曾生活居住的地方，那是诙谐、智慧、恶作剧都会让人开心的地方，天才们几乎都会以这样的地方为家，所有这些地方都拥有非常棒的干

燥空气。巴黎、普罗旺斯、佛罗伦萨、耶路撒冷、雅典，这些地方都说明了一点：天才依赖干燥的空气和晴朗的天空，也就是说，依赖快速的新陈代谢，要能一直不断地补充大量或极大量能量。我还记得，一位生性优秀和自由的智者，只是由于缺乏与本性适宜的气候而变得褊狭、羞涩、固执和牢骚满腹。若不是疾病迫使我变得理性，迫使我去深思现实世界中的理性，我自己最终也可能变成这样。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现在的我可以像一台精密准确的仪器一样解读出气候和天气对我的影响。光是一次短暂的旅游，比如从都灵到米兰，我就可以从自己的生理变化上推算出空气湿度的变化。但我还是惊恐地想起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除了最近这十年，那是生死攸关的岁月，我都生活在一些错误的地方，一些对我来说简直是禁地的地方。瑙姆堡、普福塔中学，还有图林根、莱比锡、巴塞尔，这么多地方都给我带来了身体上的不适。就我整个童年和青年时期没有留下什么美好回忆而言，将之归咎于所谓“道德”方面的原因，比如归咎于不可否认的缺乏足够陪伴，这将是愚蠢的，因为直到今天我还一直缺乏这样的陪伴，但这并不妨碍我成为一个快乐和勇敢的人。不，生理方面的无知——该死的“理想主义”——才是我生命中真正的灾难，才是我生命中多余而愚蠢的东西，从中长不出任何好东西，也无法被平衡和抵消掉。

我发现，正是这“理想主义”导致了我所有的失误，导致了我所有天性上出现的大偏差和“拘谨”，使我远离自己的人生使命。比如，我竟成了一名语文学家，为什么不至少是医生或其他什么开眼界的职业呢？生活在巴塞尔的那段时间，我全部精神生活，包括日常安排，都完全在毫无意义地浪费我异常充沛的精力，而且没有任何能量来补充消耗，甚至根本不去考虑消耗和替补问题。那时，身上没有一丝顾及自我的精细考虑，也没有任何对自我至高无上的本能性保护，有的就是将自己与他人等量齐观，这是一种“无我”状态，一种对自

己与他人区别的遗忘。但这是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地方。在我快要死的时候，由于我几乎走到生命终点了，我才开始认真思考我生命中这个根本的非理性——那“理想主义”。我的生病才把我带向理性。

3

除了营养、气候及居住地选择外，第三件无论如何不能犯错的事情是：休养方式的选择。这方面的情况也是，精神越是独特，去做可以做的事，也就是说去做有益的事时，受到的限制就会越多。

就我自己而言，一切阅读都是休养，因为阅读使我从自我中走出，得以漫游于诸多其他学科和陌生的心灵世界。阅读是我可以不用严肃认真去对待的事情，恰是阅读使我从自己的严肃认真中得到休养。我埋头工作时，你在我这里是看不到一本书的：我要保护好自己，不让人在我近处述说乃至思考，而阅读就是如此……有人注意到这个现象吗？当精神，其实是整个机体因孕育而处于高度绷紧状态时，一个偶然事件或任何外来刺激都会带来非常强烈的影响，引发严重的“撞击”。因此，必须尽可能避免偶然事件和外来刺激；自我隔离是精神孕育之首要的本能策略。

我会让一个陌生想法悄悄爬过墙头吗？——而这就是阅读……在辛勤劳作和收获成果之后，接着就是休养生息的时候了：来吧，你们这些令人愉悦荡漾着才智的书籍，我一直回避着的书籍！——这是些德语书吗？……上次我手里拿着一本书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那是一本什么书呢？——是维克多·布鲁萨尔^[19]的那本杰作《希腊怀疑论者》，其中甚至很好地运用了我的《拉尔修》一文，怀疑论者是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中唯一值得敬重的……通常我翻看的几乎总是那几本书，其实数量不多，但都是些适合我需要的。

读书繁多杂乱并不是我的风格，专门的一间读书房是我受不了的。我在天性上不喜欢博爱滥爱，对于新书我会本能地采取谨慎甚至敌视的态度，而不是“包容”“宽宏大量”以及其他各种“友爱”……其实只有几本早年法国人写的书是我一遍遍回头翻看的：我只相信法国的教育，而欧洲其他国家所谓的“教育”在我看来都是误解，更不用说德国的教育了……我在德国碰到的少数几个具有良好教养的个案，全都与法国有渊源，尤其是柯西玛·瓦格纳夫人，在趣味和鉴赏方面，她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第一高人……虽然我不读帕斯卡尔^[20]，但我喜欢他，他是基督教最有教育意义的牺牲品，他被慢慢地杀害，先是肉体，然后是心理上，这件事体现出了整个惨无人道、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谁知道呢？我身上或许还有些蒙田^[21]那样的顽皮精灵；我在艺术趣味上更倾向于莫里哀、高乃依和拉辛这样的人，而对诸如莎士比亚那样放荡的天才则不无愤恨：所有这些最终有可能会使我将现在的法国人看成是有魅力的友伴。我真的不知道，史上有哪个世纪会像今日之巴黎，涌现出那么多好奇而机智的心理学家。我可以试举几例，因为这样的人数量委实不小，比如保罗·布尔热、皮埃尔·洛蒂、吉普、美拉克、阿纳托尔·法朗士、朱尔·勒梅特尔。这个厉害种族中我要突出一位我特别喜欢的标准拉丁人，居伊·德·莫泊桑。^[22]

私下里说说，我更喜欢的甚至不是他们那些伟大的导师们，而是他们这一代，那些导师统统被德国哲学毁了，比如泰纳先生就被黑格尔毁了，正是由于黑格尔的影响，他对一些伟大人物和伟大时代出现了误解。德国所及之处，文化便受到败坏。那场战争^[23]才使精神在法国得到了“拯救”……司汤达，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偶然事件之一，因为他身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切东西都是我偶然邂逅而不是由别人推荐。他有心理学家那对事物获取先见的眼力，他对事物的描述能让人想到极其重大事件的来临（能根据丁点局部认出拿破仑），这些都是无上珍贵的；最后，他还显然是位诚实的无神论者，这在法国

不多见甚至几乎找不到，这应该感谢无神论者普罗斯佩·梅里美^[24]……也许我自己妒忌司汤达了？他从我这里抢去了那句精妙绝伦的无神论玩笑话：“上帝唯一感到抱歉的就是他并不存在。”这话原本正是我会讲的……不知在何处，我自己也曾说过：迄今为止对人实际生活最大的非难是什么？就是上帝啊……

4

从海因利希·海涅身上我获得了有关抒情诗人的至高概念，我搜索遍了千百年之久的所有年代，都没有找到像他那种既悦耳动听又热情迸发的音乐。海涅拥有一种神圣的狂野，没有这种狂野，我简直无法想象什么是完美——我评判人和种族的价值标准就是看他们如何必然地认为上帝与半人半兽的萨蒂尔神是一体的——此外，海涅还对德语有着多么特别的运用呵！总有一天，人们会说，海涅和我是遥遥领先的一流德国语言艺术家——远远超过了一般德国人对德语的各种使用。

我与拜伦^[25]的“曼弗雷特”^[26]一定有深深的亲缘关系，他的所有那些深邃在我身上都能找到——13岁时我就已经能读懂这部作品了。对于那些面对“曼弗雷特”敢于提“浮士德”这个名字的人，我都不屑开口，只有付之一瞥。德国人根本不明白什么叫伟大，舒曼就是一例。出于对这位甜腻腻萨克森人的愤怒，我还专门为“曼弗雷特”谱写了一首相反的序曲，对此汉斯·冯·比洛^[27]评价是，他还从未见过这样的乐谱，这简直是对欧忒耳佩^[28]的亵渎。

如果要我对莎士比亚做出最高评价，那永远只能是：他构思出凯撒这种典型。靠揣测，人们是想象不出这种典型的——你要么就是这种人，要么就不是。这位伟大诗人只是从他自己的实在出发在进行创

作——随着自我实在的变化甚至会出现后来不再能忍受自己作品的情形……我现在瞥一眼自己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后，就会在房间里来回走上半小时，无法控制一种由抽泣而来的难以忍受的抽搐。——我找不到任何比莎士比亚作品更让人心碎的读物了：一个人要遭受多少苦难呵，以致他如此非要成为傻瓜不可！——人们理解哈姆雷特吗？能将人逼疯的不是怀疑，而是确信……但是，要有如此体会，人必须深邃，必须思维深奥，必须是哲学家才行……我们都害怕真相……而且我承认：我本能地确定和确信，培根勋爵乃是这种极为可怕文学类型的始作俑者和自虐者，而美国这些糊涂虫和平庸者可怜的胡言乱语与我何干呢？但是，实现幻想最强大的力量不仅能与最强大的行动力，恐怖的行动力和罪恶的力量并存，——而且也是以其为前提条件的……对于培根勋爵这一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位现实主义者，我们长期了解不够，我们不是很清楚他到底做了什么？想要做什么？他自己经历了什么？……见鬼去吧，我的批评家先生们！假如当初不是用我的名字而是用另一个名字去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话，比如用“理查德·瓦格纳”，那么恐怕两千年的洞察力也不足以猜出，《人性的，太人性的》的作者竟是幻想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人……

5

这里既然已经谈到了我生活中的休养问题，我还是有必要再说一下，以感谢那件绝对最深层、最真挚地使我身心获得休养的事，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与理查德·瓦格纳的亲密交往。与其他人的交往我都可以轻易放下，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将在特里普森^[29]的那些日子从我生命中抹去，那是充满信赖、欢乐与美好意外——深邃瞬间的时辰……我不知道其他人与瓦格纳在一起的体验是什么，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天空从未飘过一朵云——由此我再次回到法国这个点上。瓦

格纳信徒以及所有那些人以为，指出自己与瓦格纳有共鸣就是对他的崇敬。对于这些人我不想去驳斥什么，只能轻蔑地撇一下嘴角……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在至深的本能中与德国的一切格格不入，甚至只要有德国人在我身旁，我都会消化不良。与瓦格纳的第一次接触也是我生命中首次出现了畅快呼吸的时辰：我视他为外国，把他当作德国的对立面，当作一切“德意志品性”的活生生的对抗者，因此我敬重他。——我们都是50年代的泥沼之气中度过童年时代的，因而对“德国”这个概念必然是悲观主义的；除了成为革命者别无选择——我们不会允许伪君子当道的状态存在，不管这样的伪君子今天如何改头换面，是穿上鲜红衣裳还是一身骑兵制服，对我都无关紧要……好吧！瓦格纳是一位革命者——他逃离了德国人……作为一名艺术家，人们在欧洲除了巴黎别无家园；瓦格纳艺术必备的在所有五种艺术感知方面的全面精巧，对细微差异的感触以及病态心理，都只有在巴黎才能找到，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种对形式问题的热情，也不会这样认真地去对待舞台布景——这是巴黎人最棒的认真所在。在德国，人们对存活在巴黎艺术家心里的宏大追求一无所知。德国人是性情温顺的——瓦格纳则绝不属于此列……关于瓦格纳归属于何处，与谁最相近，我已经说得够多了（见《善恶的彼岸》第256节及以下）：就是法国后期浪漫派。那是些趾高气扬、翱翔在高空的艺术家，比如德拉克洛瓦^[30]和柏辽兹^[31]，他们生性病态，无可救治；他们是彻头彻尾地追求表现的狂热分子，是不折不扣的艺术名家……到底谁是瓦格纳第一位聪慧的追随者呢？是夏尔·波德莱尔，他也是第一位懂德拉克洛瓦的人。德拉克洛瓦是一个典型的颓废者，一整代艺术家在他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影子。——或许波德莱尔也是最后一位懂德拉克洛瓦的人……瓦格纳让我永远不能原谅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屈尊俯就于德国人，——他成了德意志帝国的公民了……德国所及之处，文化便受到败坏。

总的看来，没有瓦格纳的音乐，我自己的生活或许到青年时代就会结束，因为命里注定我会成为德国人中的一员。人如果想挣脱不堪忍受的事，必然要靠大麻，情况应该是这样。而我靠的是瓦格纳，瓦格纳乃是对付一切德意志之物的最佳抗毒素，当然我不否认他也是一种毒剂……从我听到《特里斯坦》钢琴曲的那一刻起——感谢比洛先生的演绎——我就成了瓦格纳的景仰者。瓦格纳的早期作品在我看来还太平庸，太“德国”……如今，我寻遍所有艺术，还未发现一部作品，有像《特里斯坦》那样惊险而吸引人，有像那样拥有无限的恐怖和无限的甜美。当《特里斯坦》的第一个音符响起，达·芬奇的所有殊异魅力都会黯然失色。毫无疑问，这部作品绝对是瓦格纳无以复加的杰作，他借此使自己从《名歌手》和《指环》^[32]时期的创作中得以恢复，变得更为健康，这对于瓦格纳这样的人来说反而是一种倒退……为了能很好理解这部作品，人们必须生活在匹配的时代，而且尤其要在德国人中生活过，我将此视为头等幸事，我身上心理学家式的好奇就走到了如此远的地步。对于这种“地狱之欢乐”一个人要是从没有病态般追求过，那么，世界就是苍白的：这里用上这么一个神秘主义套语是可以的，而且几乎是顺理成章的。——我想，没有一个人能比我更好地了解瓦格纳能做到的惊人之举，也就是除了他之外无人能飞向的令人有额外惊喜的五十重世界。我这样的人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将最棘手和最危急的事转化成对我有益的事，从而变得更为强大，我也称瓦格纳为我生命的大恩人。我与瓦格纳的情形相似，我们所遭受的痛苦都要比本世纪所有人来得深重，也包括彼此之间的伤害，这还是会将我们俩的名字连在一起，直到永远。正如瓦格纳在德国人中无疑被误解了一样，我也毫无疑问地如此，而且会一直这样下去。——首先要有两百年的心理和艺术熏陶，我的日耳曼先生们！……但这是无法事后补救的。

对那些被最严格挑选出来的读者我还想说一下，我究竟从音乐中期待什么。我想说的是，音乐要令人愉快并且深沉，有如十月的午后；要独特，放任而且温柔，就像一位放纵又优雅的甜美小妇人……我决不赞同有人说，德国人能够懂得什么是音乐。所谓的德国音乐家，尤其是最伟大的音乐家都是外国人，比如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人、意大利人、荷兰人——或者是犹太人。要么就是属于厉害人种的德国人，像海因里希·舒茨^[33]、巴赫和亨德尔，这样的德国人现在已经没有了。我自己身上还有足够的波兰气质，还可以将肖邦未竟的音乐事业进行下去：出于三个理由我要将瓦格纳的《西格弗里德牧歌》排除在外，或许还有李斯特^[34]，他在优雅的管弦乐乐调方面的造诣超过了其他所有音乐家；最后，我还要将阿尔卑斯山那边出现的所有音乐都排除在外——还有阿尔卑斯山的这一边……山的这一边我不会错失罗西尼，更不会错失我的南方音乐，我的威尼斯演奏大师彼得·加斯特^[35]。当我说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时候，指的只是威尼斯。如果我要为音乐寻找另一个词的话，那么，找到的始终只有“威尼斯”这个词。我不知道眼泪和音乐有什么区别，我知道念想幸福，念想南方时会伴随一种胆战心惊的敬畏。

不久前，一个昏暗的夜晚，
我伫立在桥上。
远处飘来一阵歌声：
像金色水珠般在涌动，
又越过那碧波荡漾的水面而去。
小船儿，灯火，还有那音乐——
如醺如醉，一起融入那暮色中……

我的心啊，宛如一把弦乐，
被默默拨撩，
暗自唱起了一首船谣，
因缤纷的欢乐而颤抖。
——有人在聆听吗？

8

在选择营养、生活地点和气候以及休养所有这一切当中，自我保存本能起统率作用，用最简单直白的话说，自我保存本能乃是一种保卫自我的本能。对许多事物不去看和不去听，不让它们靠近自己，这是一种初步的聪慧并且初步表明：人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必然之物。表示这种自我保卫本能的通用语是趣味，它的命令式语气命令的是，不仅要在“是”有可能成为一种“无我”的地方说“不”，还要尽可能少说“不”，舍弃和远离那些总是一再使我们不得不说“不”的东西，原因是，防卫付出即便再小，只要成为常规和习惯，就会非常厉害地耗人精力，而且这样的消耗完全没有必要，人的大量消耗绝大多数是由少量消耗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抵御和不让靠近是一种精力付出——对此可不要搞错——是浪费在无用目的上的精力。人要是不断地必须去抵御什么，单单这一点就会使人变得十分虚弱，以致他无法再保卫自己了。——假如我走出家门，看到的不是宁静而高雅的都灵，而是那种德国小城，我会本能地封闭自己，拒绝这毫无生机的平庸世界强迫我接受的一切。或者，假如我看到的是德国大城市，那是人造出来的恶俗之地，那里，什么东西都滋生不出，无论好坏，一切都是外来的。难道我由此必须变成一只刺猬吗？但是，长刺是一种浪费，甚至是加倍的浪费，因为人本不需要长刺，是敞开双手自由站着的……

另一种聪明和自我保卫就是尽可能少做反应，并且远离那些必须立马卸掉自己的“自由”这种主创性而成为单纯反应器的境地和情况。怎么与书籍打交道，也是这个道理。根本上只会“浏览”书籍的学者——通常情况下一位语文学家一天可以浏览约两百本书——最终会完全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若不翻书，他就不会思考了，思考的时候，他只会对某个刺激，比如某个读过的思想，做出反应，——最后他只是在做出反应而已。他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回答“是”和“不”上面，放在了批评别人已经思考过的东西上——自己却不再思考了……保卫自我的本能在他身上已经变得软弱无力，否则他会抵触书籍以保全自我。这样的学者就是一种颓废者。——我曾亲眼看见，有些具有天赋，秉性丰盈而自由之人30岁时就“读书读到迟钝”，像火柴一样需要摩擦才能产生火花——即“思想”。破晓的清晨，人的精力无比清新和充沛，此时读书——我称之为罪恶！——

9

现在我必须就“如何成为本来的你”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本该有的答案了，由此就要触及自我保存——运作自我的绝妙技艺了……假如一个人的使命，所处境地以及使命之命运明显超出一般之众人，那么，最可怕的莫过于直面自己的使命了。人“成为本来的你”的前提条件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由此看来，即使是生命中的失误也有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诸如一时的歧途和邪路，迟疑不决，“谦让”以及浪费在与自身使命不相干事物上的那种较真。这里就披露出一种大智慧，甚至是最高明的智慧：*Nosce Te Ipsum*（认识你自己）^[36]会招致衰败，从而忘却自己，误解自己，贬低和矮化自己，甚至将自己视为普通人反而是理智的。

用道德的话语来说，博爱、为他人和他物而活，会成为保存最棘手自我的一种保护措施。假如我有悖于自己法则和信念，采取了“无我”的行为，那么，这是一种特殊情形：这样的行为是为沉溺自我、滋养自我服务的。人必须保持整个意识表层——意识本身就是一种表层——纯洁，不受任何伟大命令的侵扰，注意，即便是伟大话语、宏伟姿态也要全部加以提防！让本能过早地“了解自己”，是非常有危害的——此间要掌控好并去驾驭的“想法”会从内心深处慢慢滋生——它开始发号施令，慢慢把我们从歧途和邪路上引回来，为我们备好了将来实现整体目标时无疑不可或缺的各种品质和技能——在披露主导使命、“目标”、“目的”和“意义”之前，它已经在按需培植为之服务的全部能力。——从这个方面来看，我的一生简直就是非常棒的。就重估价值这个使命而言，所需要的能力可能比一个人拥有的所有能力还要多，尤其是需要那些相互对立但并不相互干扰、相互破坏的能力。能力的等级次序，距离感，不产生敌对的分离艺术，不混杂任何东西，也不“调和”任何东西。一种丝毫不凌乱的巨大的繁多，这些乃是我使命的先决条件，是我本能长期隐秘而精湛劳作之所在。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上滋生出了什么——我的全部能力都是某日突然到位且完美无缺地呈现在眼前，这非常清楚地在更高层面呵护着我的本能。我记不起来自己曾努力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一生中曾拼搏过，我的气质与英雄气概截然相反。“要”干什么，“去追求”什么，树立一个“目标”，胸怀一个“愿想”——所有这些我都未曾有过。即便此时此刻我眺望自己的未来——自己遥远的未来——，看到的是一片平静的海面：上面没有任何欲望的涟漪。我根本不想事物变成非是它所是，我自己本人也不想变成另一种样子。

我就是一直这样生活过来的，我未曾有过愿想。有谁可以在44岁后说，他从来没有为荣誉、女人和金钱努力过啊！——这些东西我并不需要……比如，就是这样，我在某日成为大学教授——在此之前我还从没有想过这种事情，因为那时我还24岁不到。同样，就在两年前

的某日，我突然成了一名语言学家：应老师李切尔^[37]要求，我的第一篇语文学论文，发表在他主编的《莱茵博物馆》杂志上。从任何意义上说，这都是我进入该领域的开端。（李切尔——我满怀敬意地提到他——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唯一的天才学者，他身上有一种我们图林根人才有的那种和蔼可亲的迂腐气，这种气息甚至能让一个德国人变得受人喜爱：——为了达到真理，我们宁愿选择隐秘曲径。我说这样的话绝没有轻视雷奥坡德·冯·兰克^[38]之意，聪明的兰克是我亲近的老乡……）

10

对于如上所述这些完全有必要进行深入思考。可能有人会问，我为什么在这里要去讲述那些通常被认为是不值得关注的小事。他们会认为，我这样做对自己有损，尤其当我还是一位注定要去完成伟大宏业的人时，更是如此。我的回答是：这些小事——营养、居住地、气候、休养以及整个有关追逐自我的论辩——超出所有概念，比迄今人们视为重要的一切还要重要。恰是在这些问题上，人们必须开始重新学习。人类迄今为止认真考量过的东西，甚至都不具有实在性，而仅仅是想象虚构的，严格来讲，是那些病态的，深深有害之人的本能行径编织出的谎言——“上帝”“灵魂”“美德”“罪孽”“彼岸”“真理”“永生”，所有这些概念都是如此……可是，人们却一直从这些概念中寻找人性的伟大和“神圣”，所有政治问题，社会制度问题以及教育问题，都已彻头彻尾地变得虚假了，因为最大的恶者被当成了伟大之人，因为人被教育成去轻视那些“小”事，也就是说，去轻视生活中那些基础之事……我们今天的文化是绝对让人看不明白的……德国皇帝跟教皇沆瀣一气，好像教皇代表的不是生命之死敌一样！……今天建立的东西三年后就不复存在。假如根据我能做什么来衡量自己的话，不去谈之后会引发的事，但就我做出的颠覆和无与伦

比的建构而言，我比任何人都更配得上“伟大”这个词。这里如果拿我跟以往被人们尊奉为一流人物的人比较，那我们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我甚至根本不把这些所谓的“一流人物”当成人。——在我看来，他们就是人类的渣滓，是病态和复仇本能的可怕结合：他们就是灾难，都是报复生命并且彻底无可救药的非人……我要成为他们的对立面：我特有的能耐是能够最敏锐地感知健康本能的所有迹象。我身上没有丝毫病态特性，即便在我病重时也没有变成病态的；要在我这个人身上找到一丝狂热的征象，也是徒劳的；没有人会在我生命的某一刻见过有狂热或悲怆举止，情感性体态不属于伟大；谁竟需要将事诉诸体态，那就是虚伪的……小心提防一切有动人姿态的人啊！——在我这里，生活变得轻松自如，在我必须应对最为艰难之事时，生活甚至会变得最为轻快。

在这个秋天的七十天里，我怀着对千秋万代的责任心，一直在不停地做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头等重要的大事。谁在这时看到我都会发现，我不但没有一丝紧张的迹象，反而精力充沛，欢乐轻快。我从未吃得如此惬意，从未睡得如此香甜。——我不知道除了用游戏方式外还能用别的什么方式来应对伟大使命：作为伟大之体现，这是重要的前提条件。一丁点儿的强迫，不悦的面色，生硬的语调，全都有悖于人性，更是对人工作效果的一种伤害……神经不能绷着……由孤独出现不悦也是一种伤害，令我感到不悦的总是“繁复”……在较早的一个时候，早得有点荒唐了，7岁那时我就已经知道，或许永远不会有人跟我交往。有谁见我曾因此而怏怏不乐吗？直到今天我依然对每个人都同样友善，哪怕面对最卑微的人都不吝赞赏之词，其间没有一丝傲慢，没有一丁点儿隐藏的蔑视。但凡我蔑视者都会感觉到我在蔑视他：只要我在场就会激怒那些体内流淌着肮脏血液的坏人……我将一个人的伟大概括为*amor fati*（热爱命运）：不要心怀他想，不管是思前还是想后，永世都不要。面对必然出现之事不要只是忍受，更不要

隐藏它——所有理想主义都蔑视必然之物，都是谎言——而是要热爱它……

[17]皮埃蒙特 (Piemonte)，意大利省份，首府为都灵，以糖果、酿酒、咖啡业世界闻名。

[18]撒路斯提乌斯 (Gaius Sallust Crispus，前86—前35)，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佚失)《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等。

[19]布鲁萨尔 (Victor Brochard，1848—1907)，法国哲学家。

[20]帕斯卡尔 (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

[21]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法国文艺复兴后期思想家。

[22]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法国作家、短篇小说巨匠。

[23]指普法战争。

[24]梅里美 (Prosper Mérimée，1803—1870)，法国作家，历史学家。

[25]拜伦 (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26]拜伦诗剧《曼弗雷特》 (*Manfred*，1817) 的主人公。尼采在1861年的一篇文章 (《论拜伦的戏剧作品》) 中首次使用“超人”一词来形容曼弗雷特。

[27]比洛 (Hans von Bülow，1830—1894)，德国指挥家、钢琴家、作曲家。

[28]欧忒耳佩 (Euterpe)，希腊神话中的音乐女神。

[29]特里普森 (Tribtschen)，瑞士卢塞恩市的一个区，瓦格纳的故乡，1869年尼采在那里初识瓦格纳。

[30]德拉克洛瓦 (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法国浪漫派画家。

[31]柏辽兹 (Hector Louis Berlioz，1803—1869)，法国浪漫派作曲家。

[32]分别指《纽伦堡的名歌手》 (*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 和《尼伯龙根的指环》 (*Der Ring Des Nibelungen*)，这两部作品是公认的瓦格纳代表作。

[33]舒茨 (Heinrich Schuetz，1585—1672)，德国作曲家。

[34]李斯特 (Franz Liszt，1811—1886)，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

[35]加斯特 (Peter Gast，1854—1918)，德国作家、作曲家，尼采的学生和朋友。因为他创作过一部歌剧《威尼斯的狮子》 (*Der Loeuve von Venedig*)，所以尼采在这里戏称他为“威尼斯演奏大师”。

[36] “认识你自己”出自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中的箴言，后来成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核心主题。

[37] 李切尔 (F. W. Ritschl, 1806—1876)，德国古典语文学家，尼采就读莱比锡大学时的导师。

[38] 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19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他是尼采在普福塔中学的校友。

三 为什么我能写出这么好的书

1

我自己是一回事，而我的著作则是另一回事。这里在谈论这些著作本身之前，我先要触及一下这些著作得到理解或没有得到理解的问题，我只是因场合之需随便谈谈，因为现在还根本没有到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受到关注的时代还未到来，有些人就是死后才得到重视的。总有一天需要建立一些机构，以便能按照我的方式去生活和传授道理，也许，甚至到那时还需要在高校设立专门教席来讲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是，倘若我今天就指望人们来听取和接受我讲的道理，那会完全背离我本意：人们现在对我讲的道理不去听也不接受，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还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不想有人将我搞错——这也包括，我不能自己看不清自己。

再重复一遍我曾说过的，我这个人一生中不会有什么恶的意志，连文字上的恶意，我也几乎举不出什么事例。但是，纯粹的蠢事却太多了……如果有人拿起我的一本书，我会认为这是他能对我做出的最为罕有的褒赏之一了。我甚至会自己在想，他还为此专门脱掉了鞋子——不是靴子哦……有一次，当海因里希·冯·施泰因博士向我坦诚抱怨他根本看不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我告诉他，这没关系：读懂其中的六句话，也就是说对其中的六句话有体会，人就会上升到比“现代”人更高的层次上了。怀有这样的距离感，有哪个我认识的“现代”人会去读我的书啊，即便想读也不会去读了。

我的成功正好与叔本华的成功相反——我说“*non legor, non legar*（现在没人读我的书，将来也不会有）”。人们在拒绝我的著作时经常会流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天真表情，这屡屡让我快乐，我不想低估这种满足感。

就在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我创作出了颇具分量，甚至太有分量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或许能使其他所有文学作品失去平衡。当时，柏林的一位大学教授好心告诉我，我得换一种方式去写作，否则这样的东西没人会读。——最后，是瑞士而不是德国出现了两个极端的事例：魏德曼^[39]博士就《善恶的彼岸》写了一篇题为“尼采的危险著作”的文章，发表在《联邦报》上；卡尔·施皮特勒^[40]先生写了一篇关于我的全部著作的综合评论，也发表在《联邦报》上。这两件事是我一生中最不寻常的了——对此我要谨慎评论……比如，第二篇文章称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在“尝试较高级的文体”并希望我以后还要同时考虑内容建设；魏德曼博士对我在努力废除一切正派情感方面表现出来的勇气表示了敬重。——这两篇文章由于使用了随性而来的小技法，文中的每个句子都很连贯，这让我敬佩。可是，文中的每句话都在颠倒黑白。其实，人们什么也不用做，只要用“重估一切价值”就能以十分引人注目的方式击中我的要害，而不是随使用某根钉子来扎我的头颅……对此我更加急切地想要有一种解释。

说到底，从包括书本在内的事物中，没有人能够获得比他已经知道的更多的东西。凡是从自己体验出发通达不到的东西，人是不会有感觉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设想有一本书，谈的尽是些这样的体验，不管是通常人还是少数人都完全无法经验到的，那这就是用语言表达这一系列全新经验的第一本书了。这种情况下，人就什么也听不见，并且会出现听觉现象中的错觉，以为在什么也听不到的地方，就什么也不存在……这正是我通常经验的情形，当然，也可以将之表述为我的经验之原本情形。

谁若是以为已经理解了我的什么东西，这其实只是从我的东西中摘取一些出来，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使之站得住脚而已——这往往跟我实际情况截然相反，比如认为我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而对我的文字丝毫都理解不了的人则声称，我根本不值得列入考虑范围。“超人”这个词指的是成长为至高无比的人物，他们与“现代”人，与“好”人，与基督徒以及其他虚无主义者截然相反——这个词出自查拉图斯特拉这位道德毁灭者之口，成了一个非常有必要去深思的词语。就是这个词几乎处处被理解成与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形象所表达之意截然相反的东西了，而且这样的理解还显得完全无可指摘。我指的是，将这个词理解成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理想主义者”，半是“圣人”，半是“天才”……因为这个词，另一位博学的傻瓜竟怀疑我是达尔文主义者。还有人甚至从这个词中读出了那个敌视知识和意志的大骗子^[41]的“英雄崇拜”，这种“英雄崇拜”正是我深恶痛绝的东西。假如我悄悄对某人耳语说，与其在帕西法尔^[42]这样的人身上寻找超人，还不如到切萨雷·波吉亚^[43]那样的人身上寻找，这个人是不会相信他耳朵的。

请大家原谅我，我一点不好奇那些对我著作的评说，尤其是出现在报纸上的，我的朋友和出版商都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从不跟我谈起这些。在一个特殊场合，我曾看到对我的一本书——即《善恶的彼岸》——所作出的种种非议，对此我都可以写出一篇标准的报道了。没有想到的是，《民族报》——普鲁士的一份报纸（我如此标注是为外国读者着想，而我自己很抱歉只读《辩论周报》）——极其严肃地把这本书看作是“时代的象征”，是地地道道的容克哲学，而《十字报》只是不敢这样说而已……

上面这些话是对德国人说的，因为在其他各处地方我还有读者——都是些出类拔萃的有识之士，他们身居高位，肩负重任，都是受过考验之人，我的读者中甚至还有真正的天才。在维也纳、圣彼得堡、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巴黎和纽约——到处都有人发现了我：唯独在欧洲的平原德国这地方不是这样。我承认，更让我欢欣的是那些还没有读过我书的读者，这样的读者要既没有听过我的名字，也没有听过哲学这个词；然而，不管我走到哪里，比如说在都灵，那里的人一见到我，就会浮现出欢快的神情，甚至市场上卖水果的老妇们见了我后都非要给我挑出最甜的葡萄才肯罢休，这是让我迄今最有受到讨好感觉的事。要想达到这种程度，非得是哲学家才行啊……

人们称波兰人是斯拉夫民族中的法国人，这不无道理，一位可感动人的俄国女子也从来不会弄错我的归属。摆出庄重严肃的样子，我做不到，非要这样的话，我会将这事最终弄得十分尴尬难堪……用德国人的方式去思考，用德国人的方式去感受——我能够做到任何事情，但是，这件事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年迈的老师李切尔甚至认为，我是像巴黎小说家那样去构思我语言学论文的——荒唐而刺激。甚至在巴黎当地，人们也惊奇于“我所有的大胆和敏锐”——这是泰纳先生的话——我担心，人们在我作品里到处都可以发现那种渗透其中的味道，直至酒神颂歌的最高形式亦如此，这个渗透其中的东西永远不会成为愚蠢的，成为“德国式的”，这是一种机智……要改变这一点我做不到，上帝帮帮我吧，阿门！

我们都知道长耳朵是什么意思，有些人甚至亲历过这样的人。好吧，我敢断言，我长着最短的耳朵。对此小女人们的兴致还真不是一点点，——我觉得，她们感觉到在我这里获得了更好的理解？……我是一个极度讨厌愚笨的人，因此是一个从世界史来看的怪物，——用希腊语来说，而且不仅仅用希腊语来说，我是敌基督者……

某种程度上我知道自己特别适合写作，在个别情况下我也清楚，习惯读我文字会“败坏”品味的，人们会再也受不了其他书籍，至少是受不了哲学著作了。进入这样一种尊贵而美妙的境地，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德国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说到底，人必须配得上这荣耀。可是，倘若有人由于意志的高度而与我相亲相近，那么，他就会体验到学习的真正狂喜，因为我来自鸟儿都不曾飞过的高空，看得清人们还茫然不知的深渊。有人曾跟我说，要放下我的书是做不到的——这样我就成了影响别人入眠的人了……世上绝对不会有比这更令人骄傲同时更精妙的书了：这些书无论在哪里都达到了尘世人力的顶点，到处都在愤世嫉俗。为了征服它们，人们不仅要用最温柔的手指，还要用最有力的拳头。任何脆弱的心灵都与此无缘，而且只要一次无缘也就永远无缘，甚至任何一种消化不良也都是这样：精神必须放松，餐饮要良好。不仅贫乏和褊狭的灵魂无法征服我的书，而且懦弱者、不洁者还有骨子里深藏报复欲望之人更不能做到这一点：我的任何一句话都会使所有不良本能现形。

我选了几个熟人做了一些试验，他们读了我的文字后反应各不相同，这些不同很有教益。丝毫不关心我书籍内容的人，比如我的朋友，就会变得“生疏”起来：他们祝我写作顺利，不断推出新著——也会期望我文字语调更欢快些，在这方面取得进步……这些绝对在堕落的“精灵”“美好心灵”，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读这些书。——因此他们轻视我的书，所有“美好心灵”都会一致如此，这成了一种美好的一致。我熟人中的那些傻瓜，恕我直言，也就是德国人，他们让我明白，人们虽然有时会与我看法一致，但并非总是同意我观点的。例如……甚至就《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就听到过如此这般的话语。

还有，人身上的“女权意识”，也包括男人身上的“女权意识”，同样会阻碍他们读懂我的著作：这样的人永远进入不了那大胆探索的迷宫。人们必须从不懈怠自己，必须要在习惯中有些刚性的东西，方能在全然冷酷的真理中感到自在与明朗。假如让我去描绘一个完美读者的形象，那他一定是一个充满勇气和好奇心的怪物，此外还要有些坚韧、狡黠和谨慎，还要是一位天生的冒险家和探索者。我在此严格去限定的人，终究没办法叙述得比查拉图斯特拉更好，那么，他要将他的谜团只讲给谁听呢？

给你们，你们这些勇敢的探求者，尝试者，巧妙扬帆在可怕大海上的人，——

给你们，你们这些沉醉于寻觅，喜爱纵横交错光线的人，听到笛声，灵魂就会冲向任何迷津：

因为你们不想用胆怯的手摸着一根引线前行，而且在你们能猜解的地方就讨厌去推断……

4

这里我还要说一下我的文体风格艺术，那是一种用符号，包括符号节律去传达情感本身之专注的状态。——这是全部风格的含义所在。由于我内心状态异乎寻常地繁复多样，所以我这里会出现极为多样的风格，多到迄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媲美。任何一种风格，只要真正传达出人的内心状态，只要不在符号、符号节律以及表情达意上出错，就是好的风格。——所有遣词用字的规则都是一种表达情感的艺术。这方面，我的本能从不出错。自在的好风格，这一说法本身就是一种纯粹的愚蠢，是单纯的“理想主义”，好比“自在之美”“自在之善”“自在之物”……所有这些都是有前提条件的，要看是否有听

众在——要看是否有具备相同情致以及配得上该情致的人在，要看是否有我们可与之分享自我的人在。——比如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就一直还在寻找这样的人——哦！他还得找寻很长时间啊！——人必须够格听他述说才是……

在这样的人出现之前，没人能理解这里所述的艺术：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运用这种专门为此创造出的、空前而全新的艺术方式。德语是否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这还有待证实：在此之前我自己应该会异常坚决地否认这一点的。在我之前还没有人知道，德语能干什么——或者说一门语言究竟能干什么——是我最先发现，用宏大韵律的艺术、遣词造句上的宏大风格去表达崇高的超人式激情拥有的那种宏伟的跌宕起伏。伴随着题为“七个印记”的酒神颂歌，也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分的最后一节，我早已飞跃到一直被称作诗歌那东西的千里之上了。

5

能从我著作中读出我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心理学家，这也许是我作品的优秀读者首先要看到的——这样的读者是我应得的，他们读我的书就像优秀的资深语文学家阅读贺拉斯^[44]的书一样。全世界基本都赞同的那些观点，更不要说那些世界盛行的哲学家，道德学家以及其他一些笨蛋蠢货了，在我看来都是幼稚的谬说，比如，自我本身只是一个“高级的欺诈”，一种“观念想象”而已，而人们却相信“利他”和“利己”是一组对立的行为……其实并不存在利己或者利他这样的行为，在心理学上这两个概念都是荒谬的。还有“人人都追求幸福”或者“幸福是良好品行的回报”，又或者“快乐与痛苦是对立的”……

道德这个人类的喀尔科^[45]彻彻底底篡改了一切心理的东西，把他们极度道德化了，甚至发展到十分荒唐的地步，认为爱情应该是“忘我的”……其实，人必须坚守自己，必须牢牢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否则你根本无法去爱。女孩子对此再清楚不过了，她们压根儿不会理睬那些无私的、只为对象着想的男人……容我冒昧地一语点破，你们会想我是够了解女人的。这是我从狄奥尼索斯那里承袭下来的，谁知道呢？可能我是最了解永恒女性的心理学家，她们都爱我——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除了那些不幸的女人，那些不能生育的“解放者”之外——有幸的是，我可不想让我自己被撕成碎片，当典型的女人爱你的时候，她们就会这样。我了解女性这样的可爱狂野之人……啊，她们是一个多么危险，潜行而隐秘的小小肉食动物啊！……一位极力报复的小女人甚至会撞倒那扇命运之门。——女人远比男人邪恶，也远比男人聪明。女人身上要是出现善良，那是变异的一种体现……女人身上展现的所有所谓“美好心灵”都是由于生理上出现了问题。——至于什么我就不说下去了，否则就是在嘲弄医学了。

追求平等权利的斗争甚至就是生理上有毛病的一种症候，医生们都清楚这一点。——一个女人的女人味越浓，她就会越是猛烈拒斥泛泛的权利：人的自然状态，两性间的永恒战争会更清楚地赋予她至高地位。——你们听到过我给爱情下的定义吗？这是唯一值得哲学家来下的定义。爱情，它的手段是战争，它的基础是两性间的仇恨。一个女人如何才能被治愈，也就是说如何才能“被拯救”？你们听到过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吗？让她生个小孩。女人离不开孩子，而男人永远只是手段，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女性解放”乃是失败女人，也就是失去生育能力的女人对健全女人的本能仇恨，反对“男人”的斗争永远只是一种手段，一个借口，一种策略。她们把自己抬高成“真正的女人”“高层次的女人”以及“理想的女人”，目的是降低女人这个整体的层级。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女性接受高等教育、

穿内裤和获得像政治动物一样的投票权。其实，那些获得解放的女性都是“永恒女性世界”里的无政府主义者，她们过得不好，她们最基本的本能就是复仇……完全就是最恶毒的“唯理想为上的”物种。

还有，这样的物种在男人那里也会出现，比如亨里克·易卜生[46]这个典型的“老处女”。——这个恶毒的“唯理想为上的”物种，其目的就是要毒害良知，毒害性爱之自然本性……为了说清楚我在这个思考中出现的正直而又严谨的观点，我想再分享一下我用以反对恶习的整个道德法典中的几句话，——我使用“恶习”这个词是在与一切种类的反自然行为作斗争，用文雅动听的话说，与一切理想主义作斗争。这些话是：“宣扬贞洁就是公然煽动反自然行为。所有贬抑性生活的做法，所有用‘不干净’这一说法对性生活进行玷污，都是对生命犯下的罪行，都是真正违背生命神圣精神的罪过。”

6

为了让大家对作为心理学家的我有所了解，我在此列举出《善恶的彼岸》中出现的一段奇特的心理描写，——但你们不能去对号入座。“这位心灵的天才，宛如那伟大的神秘者，是位诱惑之神和天生的内心捕猎者，他的声音可以沁入每一个灵魂深处。他说出的每一句话，望来的每一个眼神，都带有引诱的意图和藏有引诱的圈套。他高人一筹的地方在于懂得如何出现。——不是以他所是的样子出现，而是以他对关注者而言的样子出现。这样，大多情况下在关注者那里就会出现一种强制，强迫自己一步一步与他靠得更近，越来越内在和彻底地跟随他……这位心灵的天才，他使一切叫嚷者和沉溺于自我者静下来倾听；他能平息粗野的灵魂，让他们品尝新的欲求，——像一面镜子那样放平，任凭深沉的天空映照在上……这位心灵的天才，他教会莽撞和草率之人三思而后行；他能察觉深藏着的被遗忘的宝藏，能

从晦暗的厚厚冰层下猜测出点滴善意和甜美精神；他是魔杖，能探出常年埋藏在大量泥土和沙子中的每一颗金子……这位心灵的天才，经他触碰之后，每个人在继续前行时都会变得更加富有，不是得了恩赐并怀有惊颤，不是得了他人财富而庆幸或者紧张，而是内在地变得更加富有了，变得比从前更清新；此时心扉洞开，被一阵解冻的暖风吹拂和洞悉，也许变得更不确定，更加轻柔，更加脆弱和破碎，却充满了一时无以名状的希望，充满了新的意志和涌动，也充满了新的非意志和回流……”

[39]魏德曼（J. V. Widmann, 1842—1911），瑞士作家，曾在《联邦报》任编辑。

[40]施皮特勒（Karl Spitteler, 1842—1924），瑞士诗人、小说家，著有《普罗米修斯与埃庇米修斯》《奥林匹亚的春天》等，19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41]指苏格兰哲学家、作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代表作有《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

[42]帕西法尔（Parsifal），瓦格纳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里的男主角。

[43]波吉亚（Cesare Borgia, 1474—150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诸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

[44]贺拉斯（Horatius，前65—前8），罗马诗人，代表作为《诗艺》。

[45]喀尔科（Circe），希腊神话中令人畏惧的女巫，擅长草药、制毒，并能用魔法将敌人变成动物，其主要事迹可见荷马的《奥德赛》。

[46]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挪威作家、剧作家，代表作有《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

《悲剧的诞生》

1

为了公正对待《悲剧的诞生》（1872年），有一些东西必须忘掉。这本书之所以产生影响并吸引人，是由于其中的不合适之处——对瓦格纳主义的看法，以致瓦格纳主义仿佛成了一种上升的征兆。恰是这一点使得该书成了瓦格纳生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从那以后瓦格纳这个名字才有了大希望。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提醒我——有时是完全基于《帕西法尔》在说，对这一运动的文化价值如此高的评价之所以盛行起来，我是负有责任的。我好几次看到这部书被描述成“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再生”：人们只关注该书对瓦格纳的艺术、目标和使命的新阐释，却忽略了该书蕴含的真正富有价值的东西。

“希腊文化与悲观主义”本是一个意义明确的标题^[47]，就是说将首次去解说，希腊人如何对待悲观主义，他们用什么方法克服了悲观主义……悲剧恰恰证明了希腊人不是悲观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叔本华弄错了，其实他在所有其他问题上都弄错了。

如果较为中性一点来看《悲剧的诞生》的话，这是一部非常不合时宜的著作。人们做梦也想不到，这本书的写作是在威尔特^[48]战役隆隆的枪炮声中开始的。九月那些个寒冷的夜晚，我在梅斯^[49]围墙下担任护理伤员的工作，就在那时我将这些问题想清楚了。人们或许

很容易认为，这本书已经是50年前的东西了。该书没有涉及政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非德国的”，全书散发出令人不悦的黑格尔气息，只是在一些措辞上带着叔本华的阴郁气息。

有一个“理念”——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的对立——被延伸至形而上学领域；历史本身即是这个理念的发展；悲剧中，这个对立遭扬弃而达到统一；在这样的观点下，那些彼此从未碰在一起过的事物突然被放在了一起，彼此照亮和互相把握……例如，歌剧与革命……

这本书有两大决定性的创新，其一，对希腊人那里的狄奥尼索斯现象的解读。这本书对该现象首次进行了心理学描述并从中看到整个希腊艺术的重要根基；其二，对苏格拉底主义的理解。这本书首次看到，苏格拉底乃是导致希腊解体的工具，是一个典型的颓废者。“理性”与本能相敌，理性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危险的、摧毁生命的暴力！

全书对基督教保持了一种深深而敌意的沉默。基督教既不是阿波罗的，也不是狄奥尼索斯的，它否定一切审美的价值——而这正是《悲剧的诞生》唯一肯定的价值：从最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基督教就是一种虚无主义，而狄奥尼索斯这个象征则达到了最大限度的肯定。该书有一处影射性地提到了基督教传教士并暗示性地将其指称为“阴险的侏儒”和“地下工作者”……

2

从任何角度看，这个开端都是奇特的。针对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体验，我在历史上发现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对应物，也就是说，我史无前例地第一个把握了狄奥尼索斯这个美妙现象。与此同时我也看出，苏格拉底是个颓废者。这一论断充分表明，我具有心理学特性的那些明

确描述极少会有滑向某种道德特异反应的风险：——将道德本身看作是颓废之征兆，这是一个创新，是认识史上头等的绝无仅有的事件。

有了这两项成就，我不知道要比那些只知道比对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愚蠢至极的傻瓜要高明多少啊！——我首次看到了真正的对立：一方是蜕化的本能在隐秘的报复欲驱使下否定生命（其典型形式有基督教、叔本华哲学，某种意义上包括柏拉图哲学以及所有理想主义）；另一方是对生命的最大限度的认可，它来自旺盛的生命，来自生命的极度充盈。这是一种毫无保留的认可，它甚至肯定痛苦、过失以及我们生活中所有成问题的、怪异的东西……

对生命的这个肯定是最热情洋溢，最令人欢欣的，这不仅是最高的认识，也是最深刻的认识，而且已经获得了科学与事实的严格证实和有力支撑。既已存在的事物，没有什么要被压制，没有什么要去剔除的。基督教和其他虚无主义所拒斥的那些生活方面在价值等级序列中，其序位不知道要比颓废本能赞赏或可能赞赏的东西高出多少。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勇气，而勇气的前提条件是充沛的力量：因为人有多大勇气，探寻真理之路就会走得有多远；力量有多大，与真理就会有多靠近。这就可以说，肯定现实是一位强者必不可少的，而惧怕和逃避现实则是一位弱者（在虚弱影响下）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追求“理想”。弱者无法认识到，颓废必然需要谎言，这是它们的存在条件之一。但凡不仅把握了“狄奥尼索斯”，还用“狄奥尼索斯”这个词把握了自己本身的人，就没有必要再去反驳柏拉图或者基督教或者叔本华了——他会嗅到那腐烂之气……

至于我究竟怎样借此发现了“悲剧性”这个概念，怎样形成了有关悲剧心理的最终认识。这些我最后一次还在《偶像的黄昏》第139页谈到：“肯定生命本身，哪怕是在生命出现了最怪异最棘手的问题时，也要如此；生命意志在失去其最高形态时依然欢欣于其固有的无尽延续——我把这叫做狄奥尼索斯式的，视之为通向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同情，不是为了通过一种激烈的宣泄来净化某种有害情感——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误解——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同情，成为对生成本身的永恒快乐，这种快乐也包括毁灭的快乐……”

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自称为第一位悲剧哲学家——也就是与悲观主义哲学家完全对立和相反的。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将狄奥尼索斯转化成一种哲学情致：那是因为缺乏悲剧智慧。我自己曾在早于苏格拉底两个世纪的希腊伟大哲学家那里寻找过这种智慧的征象，结果一无所获。只有赫拉克利特使我怀疑有点这味道，与他接近，我的心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感到更温暖，更惬意。对消逝和毁灭的肯定，这种狄奥尼索斯哲学中决定性的东西，肯定对立和争斗，肯定生成，哪怕为此彻底拒斥“存在”这个概念——对此，我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这里面有与我以往思考极其相近的东西。“永恒轮回”的学说，也就是有关万事万物绝对无限循环的学说——这个查拉图斯特拉的学说，可能终究已经由赫拉克利特传授过了，至少斯多葛学派是有这方面迹象的，斯多葛学派的几乎所有基本观点都继承自赫拉克利特。

4

这本书讲述着一个巨大的希望，无论如何我都没有理由放弃音乐中这个对狄奥尼索斯未来的希冀。让我们放眼看看一个世纪以后，让我们来假定，我对两千年来的违反自然和败坏人类的攻击取得了成

功，一群新生命承载着提升和完善人类这一最为宏大的使命，包括无情消灭一切蜕化者和寄生虫，他们将使地球上重新出现那样的众多生命成为可能，也就是狄奥尼索斯状态从中得以复现的那些众多生命。我预言一个悲剧时代将会到来：当人类意识到最艰辛又不可或缺的争斗，却不因此经受痛苦之时，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即悲剧，就将再生……

一位心理学家也许还会补充说，我青年时期在瓦格纳音乐中听到的东西与瓦格纳毫无关系，在我描述狄奥尼索斯式音乐时，我描述的只是我听到的东西，也就是说，我本能地将一切东西转化，变形到充盈在我内心里的全新精神中。这方面的证据就是我的著作《瓦格纳在拜罗伊特》。这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了：其中所有涉及重要心理问题的地方谈的都是我，——文中凡是出现瓦格纳名字的地方，人们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换上我的名字，或者换上“查拉图斯特拉”。书中描述的酒神颂歌艺术家的整个形象就是先在的查拉图斯特拉作者的形象，描述深刻至极，但从不触及实际的瓦格纳。瓦格纳本人知道，他在这本书中是看不出自己的。——同样，“拜罗伊特思想”就转化成某种对于熟悉查拉图斯特拉的人来说不难理解的东西：转化成无比出类拔萃者献身于最宏伟使命时恰好身处的那个伟大正午——谁知道呢？这是对一个我将会去经历之喜庆场景的想象。……该书头几页的豪情具有世界史意义，第7页上谈到的目光是真正查拉图斯特拉目光；瓦格纳，拜罗伊特，还有许多小小的德意志的全部不幸，宛如一片浮云，其上映射出未来无穷无尽的海市蜃楼，甚至我自己天性中的所有重要特征都以心理体现的方式映射在了瓦格纳身上，诸如最光辉与最具毁灭性力量的并存，无人堪比的权力意志，毫无顾忌的精神勇气，不会压制行动意志的无止境的学习动力。

这本书中的一切都在预示：希腊精神的再生在临近，亚历山大的反对者必将出现，他们会将亚历山大砍断的希腊文化之戈尔迪之结重

新系上……倾听这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强音吧，由此在第30页上引出了“悲剧意识”概念：这本书中都是些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强音。这是史上最为奇特的“客观性”了，也就是说，对于我是什么的绝对可靠信息都反映在任意某个偶然事物上了，——从骇人的深处述说着关于我的真相。我在第71页上以精准的确定性描述和预言了查拉图斯特拉风格，在第43至46页，人们可以读到我对查拉图斯特拉事件壮观无比的表述，那是净化和献身人类的惊人之举。

[47] 在1886年《悲剧的诞生》的再版中，尼采就使用了这个副标题。

[48] 威尔特（Woerth）系德国西南部小镇，普法战争的战场之一。

[49] 梅斯系法国东北部边境小镇。

《不合时宜的考察》

1

《不合时宜的考察》中的那四篇文章绝对富有战斗气息，它们证明了我并不是“梦想家汉斯”[\[50\]](#)，而是一个很乐意拔剑出鞘的人，——可能还表明我的手腕自由灵活到令人害怕。第一篇[\[51\]](#)（1873年）攻击的是德国教育，那时我已经非常无情地鄙视它了。德国教育没有意义，没有实质性内涵，没有目标，只是一种“公共意见”。由德国武器上的巨大成功——甚至由德国战胜法国的胜利——去证明德国教育有那么一些可取之处，这是太有害的误解了……第二篇文章[\[52\]](#)（1874年）揭示了我们科学活动中那些危险的，侵蚀和毒害生命的东西：非人化的齿轮装置和机械系统，劳动者的“非个性化”以及“劳动分工”的错误经济学，都使生命患了病。文化这个目的失落了，科学活动这个手段变得野蛮……在这篇文章中，本世纪引以为骄傲的“历史性事件”首次被看成是病态，看成是沉沦的典型标志。而第三篇和第四篇文章[\[53\]](#)则与此相反，树立了两个极度沉溺自我、关注自我的形象，以指向一个更高级的文化概念，指向“文化”概念的重建。这两个形象完全不合时宜，他们对周围诸如“帝国”“教育”“基督教”“俾斯麦”和“成就”这样的东西一概嗤之以鼻，——他们就是叔本华与瓦格纳，或一言以蔽之，就是尼采……

在这四篇文章中，第一篇是极其成功的，这篇文章引起的喧嚣骚动，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我戳到了一个胜利民族的痛处，也就是说，这个民族赢得的胜利并不是文化之结果，而是某种或许与文化完全不相干的东西所致。

反响来自四面八方，绝不仅仅来自大卫·施特劳斯^[54]的那些老朋友们。这位施特劳斯，我曾将他描述为德国教育庸人和自满自得之辈，并简短指出他就是那本空谈“新旧信仰”的《福音书》的作者，这使他显得滑稽可笑（——“教育庸人”一词自从在我这本书中出现后就在德语中留了下来）。施特劳斯的那些老朋友们是一些符腾堡人和施瓦本人，当我觉得他们的杰出人物，他们的施特劳斯滑稽可笑时，这深深刺痛了他们，他们的反应正如我意料的那样，幼稚而粗野；普鲁士人的不满反应则更为聪敏些，——更多带有“柏林蓝”的味道；最无礼的要算莱比锡一家报纸了——就是臭名昭著的《边境信使报》，我费了很大功夫才稳住被激怒的巴塞尔人不要采取行动去回应。只有几位老先生无条件地站在我这一边支持我，原因各不相同，部分还无法探明。其中有一位是哥廷根的埃瓦尔德^[55]，他指出，我对施特劳斯的攻击是致命的；还有一位是老黑格尔主义者鲍威尔^[56]，自那时起，他就成了最关注我的读者之一。在他的晚年，他常常提到我，比如他曾暗示普鲁士历史地理学家冯·特莱齐克^[57]先生，到谁那里可以请教到有关“文化”这个业已失落概念的信息。有关我和我的这篇文章发表的最有分量和最长的评论，出自维尔茨堡的霍夫曼^[58]教授之手，他曾是哲学家巴德尔^[59]早年的学生。他从我这篇文章中预见到了我的一个伟大使命，那就是引发一种危机以及在无神论难题上作最后决断，他猜出我属于在这个问题上最本能的、最无所顾忌的那一类人。正是无神论把我引向了叔本华。

流传最广、激起最多辛辣感受的评论是卡尔·希勒布兰特^[60]对我这篇文字极富力量和胆量的赞赏，他平素温文尔雅，可以说是最后一位善于写作而又人道的德国人。他的那篇文章发表在《奥格斯堡报》上，如今收录在他的文集里，只是措辞变得略加谨慎。该文将我那篇文章称为重大事件、转折点，对自我的首次深入思考，是德国人对精神事物的严肃与激情开始真正复归的完美标志。希勒布兰特对我这篇文章的形式，成熟的品味以及对人与事的完美区分不吝溢美之词：他赞赏我这篇文字是德国历史上最佳的论战作品——这种论战艺术恰恰对德国人来说却是危险而不可推荐的。他对我的文章表达了按捺不住的肯定，甚至突出了我斗胆就德国语言退化所讲的话（——如今，纯语言主义者就体现出这种退化，而且再也造不出一个像样的句子），他同样蔑视这个民族的“一流作家”。最后，他以对我勇气的赞赏结束了他那篇文章，他写道：“这至高的勇气将那些民族宠儿送上了被告席。”……

希勒布兰特这篇文章给我生命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影响，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来袭扰我了。人们开始沉默，在德国，人们以一种阴沉的谨慎来对待我：多年来我充分享受着绝对的言论自由，这种自由是如今没有任何人完全拥有的，至少在“帝国”内。我的天堂就在“我宝剑投下的阴影中”。……实际上我践行了司汤达的一句格言，他建议人们用决斗来步入社会。看我选择了怎样的对手啊！德国一流的自由思想家！……实际上，由此首次表达了一种全新的自由思想：直到今天，没有什么比全欧洲和全美洲的“自由思想家”之流更让我感到怪异，感到格格不入了。他们是一群怀有“现代观念”的无可救药的小丑和傻瓜，比起他们对手中的任何一位，我与这些人的分歧更深刻。他们也想以自己的方式，也就是说按照自己的观念来“改良”人类。他们如果真明白了我之所是和我之所愿，就会对我发起一场势不两立的战争，——他们全部还相信“理想”……而我则是第一个非道德论者——

我不想断言，《不合时宜的考察》里最后两篇，也就是分别以叔本华和瓦格纳来标识的那两篇文章，会对人们理解这两个人或只是理解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心理学问题有什么特别帮助。当然，有些个别之处例外，比如我在文中凭借来自本能深处的确凿判断，指出瓦格纳本性中带有一种演员天赋，其创作手段与意念只是这一天赋的产物。其实，在这两篇文章中我想做的是与心理挖掘完全不同的事儿：研讨一个前所未有的教育问题，一种对孕育自我，呵护自我的全新理解，包括这方面出现的棘手情形。这是一条通向宏伟和迎向世界历史使命的道路，这条道路终要有人去指明。

大体看来，我抓住了两个著名但还没有完全说清的类型，就像人们抓住一个契机一样，为的是发表一些看法，更多地掌握一些范式、征象和话语手段。对此我在《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三篇第93页上以十分巧妙的方式进行了提示。柏拉图也曾这样使用过苏格拉底，以此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现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再回首当时情形，我不想否认，这些文章讲的其实就是我自己，这些文章就是我当时心境的写照。《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一文是我对自己未来的憧憬，《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则记载了我最内在的心路历程和我的成长。最为重要的是我的誓愿！……今天我成了什么，身居何处——我身居这样一个高处，我不再用话语而是用闪电在说话——呵，当时我离这一点多么遥远！——但我曾见到过这片土地——对于道路、海洋、危险——和成功，我一刻也没有迷惑过。许下诺言时的巨大镇定，对那未来的幸福展望，那不会仅仅留于设想的未来！文章里的每个词都是我内心深刻体验过的，其中不乏深切的痛楚，还有一些直接带有血气的话语。然而，一阵伟大自由之风吹走了一切，创伤本身并没有起到阻碍作用。

我视哲学家为一堆可怕的炸药，在他面前一切事物都岌岌可危；我自己对哲学家的理解与其他人完全不同，并且远远胜过他们。在我看来，就连康德也不能算作哲学家，更不要说那些学院派的“反刍动物”和其他哲学教授了。这篇文章对于人们看清我对哲学家的理解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而且得承认，这里其实不是“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在说话，而是叔本华的对立面，“作为教育家的尼采”在述说。——鉴于我当时的工作方式是学者型的，而且或许还由于我对这样的方式运用自如，文中突然出现了一段艰涩的学者型心理学话语，这不是没有意义的：这表达了一种距离感，并且使我深深确定什么才是我的使命，什么仅仅是手段，阶段性工作和附属产物。我的聪明之处在于，为了能归于一，达到一，我先经历了多，到过许多地方。我注定得做一段时间的学者。

[50] “梦想家汉斯”系瓦格纳《纽伦堡的名歌手》中的人物。

[51] 指《大卫·施特劳斯：告白者与作家》。

[52] 指《论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53] 分别是《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和《瓦格纳在拜罗伊特》。

[54] 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 1808—1874），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代表作是《耶稣传》。

[55] 埃瓦尔德（Georg Heinrich August Ewald, 1803—1875），德国神学家和东方学家。

[56] 鲍威尔（Bruno Bauer, 1809—1882），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之一。

[57] 特莱齐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政治家。

[58] 霍夫曼（Franz Hoffmann, 1804—1881），德国哲学家。

[59] 巴德尔（Franz von Baader, 1765—1841），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哲学家。

[60] 希勒布兰特（Carl Hillebrand, 1829—1884），德国历史学家，散文家。

《人性的，太人性的》及其两个续篇

1

《人性的，太人性的》是一场危机的纪念碑，这是一本为自由精神而写的书：书中几乎每一句话都表达了一种胜利，也就是说，我肃清了身上不合乎我自然天性的东西。理想主义就属于此列：这本书的书名是说，“在你们看到理想之物的地方，我看到的却是人性的，啊，太人性的事物！”……我更了解人……这里“自由精神”一词只能理解为一种变得自由的精神，而不可能是其他什么，精神由此重又回到自身。

这本书里，说话的语调和声调都完全变了：人们可能会觉得这本书睿智、冷酷，有时也不乏生硬和尖刻。某种高雅趣味精神似乎在不断对抗地面上一股更具激情的潮流，并试图占据主导。如此看来，为了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这本书赶在1878年出版，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伏尔泰与他之后的所有作家相反，他首先是一位精神大贵族，而我恰好也是如此。——伏尔泰这个名字出现在我的一本著作中，这委实是一种进步，一种走向我自己的进步……你如看个仔细，就会发现一个冷血无情的精神，他洞悉理想的所有隐秘栖身之地，这栖身之地乃是它们仅存的堡垒和最后的避难所。他手中举着火炬，发出的光亮十分坚定，没有丝毫迟疑摇晃，用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了理想所藏身的隐秘世界。这是一场战争，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场

没有杀气的战争，一场没有悲情和残肢断臂的战争。——所有这一切本身或许依然还是“理想主义”。一个又一个迷失被冷静地搁在冰上，理想并没有遭到驳斥，而是被冻了起来……在这里比如，“天才”被冻了起来，不远处“圣人”被冻了起来，在一根粗大冰柱下“英雄”被冻了起来；最后，“信仰”也被冻了起来，所谓的“信念”，甚至“同情”都明显冷却了——“自在之物”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被冻了起来……

2

我是在第一届拜罗伊特音乐节的那几周里开始写这本书的，当时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怀有深度的陌生感，而这正是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前提之一。若是有人知道那时在我经过的道路上掠过怎样的幻景，他就会明白我有一天在拜罗伊特醒来时是怎样的感受，全然是在做梦一样……我是在哪儿呀？我什么也认不出来了，我几乎连瓦格纳也认不出来了。我寻遍了我的记忆，只是徒劳。特里普森——那个遥远的幸运之岛，丝毫没了和记忆相似的痕迹。奠基典礼^[61]那几天无与伦比的日子，发起庆典的那个私密小团体，那些人身上你不会看到有什么对细腻事物的敏感，现实没有了一点和记忆相似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瓦格纳被德国化了，他的信徒主宰了他！——德国的艺术！德国的大师！德国的啤酒！……

我们这些其他人非常清楚，瓦格纳的艺术只是面向那些技艺十分精湛的艺术家和那些具有世界性趣味的人，因此当我们发现瓦格纳被披上了德意志“品性”外衣时，我们感到格外愤怒。我想我是了解瓦格纳信徒的，我已经见识过三代他们这样的人了，最初是将瓦格纳与黑格尔混为一谈的已故的布伦德尔^[62]，后来是拜罗伊特新闻界的“理想主义者们”，他们将瓦格纳与自己混为一谈，——我听到过

“美丽灵魂”有关瓦格纳的各种各样表白。这是一个会说漂亮话的王国——实际上，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团体！诺尔^[63]、波尔^[64]、科尔^[65]用优美的言辞在胡说八道。他们当中不乏怪胎，甚至还有不少反犹太主义者。——可怜的瓦格纳！他已经沦陷至何种境地了啊！——他要是至少沦陷至猪群里就好了，可他却沦陷到德国人那里！……为了教育后代，真该把一位纯正的拜罗伊特人制成标本，最好是浸泡在酒精里保存，因为这里缺的就是酒精——，贴上标签写道：人们据以建立“德意志帝国”的“精神”就是这样……

我已经受够了这些，还在音乐节期间，尽管有位迷人的巴黎女子尽力安慰我，我还是很突然地离开拜罗伊特外出了几周，我只是向瓦格纳发了一封令人不快的电报表示歉意。在博姆林区深处一个森林环绕着的名为克林根布润的地方，我的忧郁和对德国人的蔑视就像疾病一样困扰着我，我时不时会在我的笔记本上，在“犁”这个总标题下，写上一两句话，都是些纯心理学性质的话语，这些话语也许可以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找到。

3

那时在我身上发生的事不只是与瓦格纳决裂——我感觉到自己的本能整个地误入歧途了，而其中单个的失误，不管是瓦格纳也好，还是我在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务也好，都是这总体迷误的一个征兆。对自己的烦躁占据了我内心，我明白，该是好好反省自己的时候了。一瞬间，我不无惊恐地恍然大悟，多少时光已然白白浪费——我的整个语文学研究与我的使命相比显得多么无用，多么刻意，我为自己这种虚假的谦虚感到羞愧……十年过去了，在这期间我的精神完全停止了吸收养分，我丝毫没有再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我积攒起一大堆满是灰尘的学识，却荒唐地忽视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用一双视力极差的

眼睛在古希腊韵律学家当中小心翼翼地摸索——当时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我遗憾地看到自己面色憔悴，身形消瘦。我的知识当中缺乏现实，而“理想”只有魔鬼需要！

后来，我被心中燃起的渴望攫住，从那时起，我实际上所做的事只在心理学、医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只有当使命强烈逼迫我时，我才会回到原来的历史研究中。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首次揣摩到选择违背本性的工作，即所谓人最后不得不去做的一份“职业”，与那种用麻醉术（比如瓦格纳艺术）来麻痹空虚感和饥饿感的做法之间，存在着关联。通过仔细观察周边的人我发现，为数众多的年轻男子都面临同样问题：一个违背本性的活动势必会导致下一个违背本性的活动。在德国，确切些说在“德意志帝国”，太多的人都被迫在不合适的时候选择职业，然后，在一个后来再也摆脱不掉的重负之下衰弱下去……这些人对瓦格纳的渴求就像他们对鸦片的渴求一样——他们由此暂时忘记自己，暂时摆脱自己……我在说些什么啊！竟说了五六个小时！

4

那时我的本能坚决反对继续屈从、随波逐流和迷失自我。任何一种生活，最不好的生活条件，疾病和贫困——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要比我曾沦陷其中的那种有失尊严的“无我”要好。最初，我由于无知，由于年轻，而误入了这种“无我状态”，后来，由于惰性和出于所谓的“责任感”而一直陷于其中。这时，来自我父亲的一种可怕的遗传，以一种我不太能赞赏的方式，及时帮了我，——其实是一种早夭的征兆。这场病慢慢将我拯救了出来：它使我免于任何形式的断层、粗暴和唐突行为。那时我并没有失去善意，反而获得了更多。同时，这场病赋予了我完全改变自己全部习惯的权利；它允许我忘记，

迫使我去忘记；这场病使我必须静卧、悠闲，使我必须去等待和有耐心……而这些就意味着去思想啊！……我的眼睛自己完全结束了书虫生活，用德语来说，就是结束了语文学生活：我从书本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很多年不再读书——这是我为自己做过的最有益的事了！——那个最深处的自我，好像被活埋了似的，在长期不得不去听从他人的自我（那就是阅读）时逐渐失声，现在他又慢慢地苏醒过来，苏醒得有些胆怯和迟疑，——但最后还是重新开口说话了。我从没有像在身患重病、忍受剧痛时期那样幸福过：人们只要看一看《朝霞》或《漫游者及其影子》，就能明白这种“回归自我”意味着什么了：那是至高的痊愈本身！……其他的痊愈都只是从中衍生出的。

5

《人性的，太人性的》是严格进行自我培育方面的一座丰碑，有了这样的自我培育，我彻底摒弃了身上所有的“高级废话”“理想主义”“美好感觉”以及其他女性化的东西。这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在索伦托^[66]写的，最终完稿和定型是在巴塞尔度过的那个冬天，那里各方面情况要比索伦托差。实际上是彼得·加斯特先生在认真为这本书费心出力，他那时还是巴塞尔大学一名学生，对我很好。我那时头上缠着绷带，还伴随着头疼，于是我就口述，他来记述和校正——其实，他才是这本书的真正写作人，我只是创作人而已。当这本书最终完成送到我手上时，令当时身患重病的我大为惊喜，因此我寄了一些出去，其中有两本寄往拜罗伊特。奇妙而极为巧合的是，一本精美的《帕西法尔》同时寄到了我这里，上面有瓦格纳给我的题词“献给我亲爱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尼采，——教区委员理查德·瓦格纳”。——这两本书的交错让我似乎感到了不详，这听起来难道不像两把剑在交锋的声音吗？……无论如何，我们两个人似乎都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双方收到书后都没有再出声。——就在这个时候，最早的几期

拜罗伊特报纸出版了：我意识到，有什么事要让我知道了。难以置信啊！瓦格纳成了虔诚的基督徒……

6

那个时候（1876年）我是怎么看我自己的，我对自己肩负的使命以及这份使命内蕴之世界历史意义所怀有的巨大确信，都已经记载在这整本书里，尤其体现在书中一段表述明确的文字里：出于本能的机警，我在这本书里依然避免使用“自我”这个词，而且这一次我没有将世界历史性荣耀照射在叔本华或瓦格纳身上，而是照在了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出类拔萃的保罗·瑞^[67]博士身上，——所幸较之于他人，他是一位异常精细之人：我总是能在我的读者当中识别出那些不再心存希冀之人，比如这位典型的德国教授，依据是，他们根据那段文字认为，必须把这整本书理解为更高级的保罗·瑞思想……实际上，这本书与我这位朋友的五六个原理相冲突：对此人们可以查阅《道德的谱系》的序言。——其中一段文字写着：最勇敢也最冷静的思想家之一，《论道德感的起源》一书的作者（参阅尼采，第一位非道德论者），以其对人类行为的深入和透彻分析，得出的主要原理到底是什么呢？“道德之人并不比肉身之人更加接近理智世界——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理智世界存在……”这一论断在历史知识的锤击下变得坚硬而锋利（参阅《重估一切价值》），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候——1890年吧——可以充当斧头，把人类的“形而上学需求”连根砍断。这对人类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谁能说清？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有重大后果的论断，有益又可怕，这在以双重视角看世界，而一切伟大的认识都在用这双重视角看世界……

^[61]1872年尼采参加的一次典礼。

^[62]布伦德尔（Karl Franz Brendel, 1811—1868），德国作曲家。

[63] 诺尔 (Ludwig Nohl, 1831—1888), 德国音乐学者。

[64] 波尔 (Richard Pohl, 1826—1896), 德国音乐评论家。

[65] 科尔 (J. G. Kohl, 1808—1878), 德国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

[66] 索伦托 (Sorrent) 系意大利那不勒斯湾一个城镇, 著名旅游胜地。

[67] 保罗·瑞 (Paul Rée, 1849—1901), 德国心理学家, 著有《论道德感的起源》一书。

《朝霞：关于道德偏见的思考》

1

我以这本书打响了反对道德的战役。书中没有一丝硝烟的味道：如果你的嗅觉有些许灵敏的话，会在书中闻到完全不同的，比硝烟要亲切得多的气息。书中既没有隆隆的炮声，也没有间隙的枪声：如果说这本书的效果是消极的话，但它所运用的手段却没那么消极，就是让效果以自己得出结论方式出现，而不是以大炮轰击的方式直接轰打出来。如果考虑到迄今在道德名义下受尊重甚至崇敬的那些东西而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人们要与该书作别，那也必须看到这一事实：这本书中没有任何否定的字眼，没有任何攻击的言论，也没有任何恶毒的话语——恰恰相反，它就像一头海兽慵懒惬意地倚在岩石之间晒太阳。其实，我自己就是这只海兽：这本书里的几乎每一句话都是我在热那亚附近的岩石堆上构思酝酿出来的。那时我孤身独处，与大海窃窃私语。直到现在，当我偶尔接触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觉得几乎每句话都变成了钓钩，用这钓钩我又能从深渊里钓上某种令人惊颤不已的东西：它全身皮肤因温柔又可怕的回忆而战栗。

这本书之所以高人一筹，是因为其中有着不可小看的東西：它大致捕捉住了那些悄无声息倏忽而过的事物，比如我称之为神圣蜥蜴的瞬间——它不会像那位少年希腊神祇那样残暴，将可怜的蜥蜴直接刺穿^[68]，但还是会用某种尖物，比如笔头去戳住它……“还有那么多

朝霞尚未闪耀”——这句印度铭文写在了这本书的扉页上。本书作者要到哪里去寻找那新的黎明，那尚未出现、开启新一天的朦胧曙光呢？——啊，那一连串的新日子，那整个世界的新日子！要到重估一切价值中去寻找，要摆脱一切道德价值的束缚，要去肯定和信赖一切长期以来被禁止、蔑视和诅咒的东西。这本肯定之书向一切被视为不好的事物发出光芒，爱意和温馨，使这些事物重获“灵魂”，重获安心和进入生活的高尚权利和优先权。道德并没有受到攻击，人们只是不再理会它了。……这本书以“或者？”结尾，这也是唯一一本以“或者？”作结尾的书……

2

我的使命是为人类准备好一个进行自我反省的最佳时刻，那可以是一个了不起的正午，一个回首过去和展望未来的正午，一个摆脱偶然性和传教士支配的正午，一个首次从整体上去追问“为什么”“为何目的”的正午。——这个使命是以下认知的必然结果：人类不会自发地走上正确道路，人类受到的治理绝不是神性的，恰恰相反，正是在最为神圣的价值概念名义下，人的否定本能、腐化本能和颓废本能是以引诱的方式得到管理的。因此对我而言，道德价值观源起何处的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人类的未来。

要求人们相信，一切都处于最好的掌控中，相信《圣经》这样一本书会就神性驾驭和人类命运中的智慧给出最终答案，这样的要求放回到现实中去，那就是一种意志，一种不让与此相反的可怜真相暴露出来的意志，即人类迄今一直处于最坏的掌控中，人类命运掌握在那些不健全之人、阴险狡诈的极爱报复者和所谓的“圣徒”手中，这些“圣徒”满世界造谣诽谤，是人类的败类。教士们（包括哲学家这隐蔽的传教士）不仅掌控着特定宗教团体，还成了无所不在的主宰。

颓废的道德、求终结的意志，竟然成了道德本身，由此生发出的决定性症候就是：利他主义成了绝对的价值，利己主义却处处受敌视。凡是在这一问题上不同意我的人，我都认为是传染上利他主义了……可是整个世界都不同意我了……

对于一位生理学家来说，如此这般的价值对立是毋庸置疑的，一个有机体内极微小的器官在自我维持，力量补偿和“利己主义”方面哪怕有丁点儿减退，都会导致整个机体的蜕化。这位生理学家会要求切除坏死部分，他拒绝任何器官与坏死的部分共存，他对这些部分没有任何同情。但是，教士们想要的恰恰是整体的蜕化，全人类的蜕化：因此他们保留坏死的部分，为的是要不惜代价来统治人类。那些骗人的概念，辅助道德的概念，诸如“灵魂”“精神”“自由意志”“上帝”之类，假如不是要在生理上毁掉人类，它们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人们不再重视自我保存和增强机体力量，也就是不再重视增强生命力，如果人们以败坏身体为代价去建构一个理想，用蔑视身体来“拯救灵魂”，那么，这不是一贴导致颓废的药方还能是什么呢？——不着要点，违背自然本能，一句话“无我”——迄今的道德就是如此……我用《朝霞》一书开始了与扼杀自我之道德的斗争。

[68]这里的“少年希腊神祇”指阿波罗。阿波罗的一个著名形象，就是在棕榈树旁捕捉蜥蜴。

《快乐的科学》

《朝霞》是一部肯定之书，深刻又不失明快、亲切。这一点也在最大程度上与《快乐的科学》匹配：书中几乎每一句话都巧妙融合了深刻的思想和轻松的戏谑。有首诗表达了我对那曾经历过的美妙无比之一月的感激之情——这整本书都是那一月馈赠的礼物——这首诗充分表明，科学要从怎样的深处着手才会变得快乐有趣：

你用燃烧的长矛
刺融我灵魂中的坚冰，
因此我的灵魂呼啸着向前冲去，
冲向那至高的希望之海：
一路变得愈加明快，愈加纯净，
自由自在翱翔在最钟爱的必然性中——
因而我的灵魂盛赞你的神奇，
最美的一月！

有人要是在《快乐的科学》第四篇结尾处读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头那些如钻石般闪耀的字句，或者在第三篇结尾处读到那些

如花岗岩一般的句子，句中首次简明扼要表达了适合于所有时代的命运，他还会对这里所说的“至高的希望”指什么有疑问吗？

《自由鸟王子之歌》绝大部分是在西西里岛写成的，这些诗句强烈使人想起普罗旺斯语中“la gaya scienza”^[69]一词，使人想到歌手、骑士和自由精神的统一。正是这些东西使得普罗旺斯神奇的早期文化与一切其他含混不清的文化区分出来，令人瞩目，尤其是最后一首《致米斯特拉尔^[70]》，这是一首热情洋溢的舞曲。恕我直言，这首舞曲中人们跨越道德而欢舞，这是地地道道的普罗旺斯主义。——

^[69]在普罗旺斯语中，“la gaya scienza”一词指诗歌艺术。

^[70]米斯特拉尔（Mistral，1830—1914），法国诗人，一生致力于复兴普罗旺斯语。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为所有人又不为任何人的书》

1

现在我要来讲讲《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故事。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永恒轮回思想，这是对人所能达到之肯定的最高表述。这一思想产生于1881年8月，那时我把它记在一张纸上，并在下面附了这样一句话：高于人类和时间6000尺。那天我正好在希瓦尔波拉纳湖^[71]畔的树林里散步，然后在离苏尔莱不远的一块巨大岩石旁停了下来，那巨石坚实厚重，形状像一座金字塔。永恒轮回思想就是在那一刻从我脑海中冒了出来。

现在回过头看，我发现，在那天之前的几个月，我的品味突然发生了重大转变，尤其在音乐方面，这是一个征兆。人们或许可以将整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归入到音乐中——当然前提是，需要某种聆听艺术的再生。1881年春天，我在雷科阿罗的维琴察^[72]附近的一个小型山区浴场度过，在那里，我和演奏大师兼朋友彼得·加斯特（他同样也是一位再生者）一道发现，音乐这只长生鸟^[73]从我们身旁飞过，那羽翼是从未有的轻盈和灿烂。要是从那天开始算起，往下算直到1883年2月，这本书在极不可能的情况下突然降生，整个孕育阶段持续了十八个月，书的结尾部分刚好在理查德·瓦格纳于威尼斯逝世的神圣时刻完成，我在本书序言中引用过其中的几句话。这刚好十

八个月的孕育时长可以表明，我实际是一头母象，至少佛教徒会这么想。其间还穿插了《快乐的科学》的写作，这本书有成千上万个迹象显示，我正在接近某种无与伦比的东西，查拉图斯特拉本身最终是从这开始的，《快乐的科学》第四篇倒数第二节道出了有关查拉图斯特拉的基本思想。

还有，那首《生命颂》（用于男女混合合唱和管弦演奏）也是在这期间完成的，总谱由E. W. 弗里茨两年前在莱比锡出版。《生命颂》的诞生或许是呈现我那一年状态的重要征兆，那一年里，我内心极其强烈盘踞着一种肯定情怀，我称之为悲剧情怀。今后终有一天，人们会唱着这首颂歌来怀念我，对于歌词我要郑重声明，流传的说法有误，那歌词不是出自本人之手，而是出自一位年轻俄罗斯女郎的惊人灵感，也就是我的朋友莎乐美小姐^[74]。谁要是能听懂这首诗最后几句的意思，他就会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偏爱和赞赏这首诗：这几行诗句有其宏大之处，并没有把痛苦视作生命的阻碍：“如果你已经没有任何幸福可以给我了，那好！你还有痛苦可以给我……”这里，我的音乐或许也有其宏大之处。（这里，双簧管的最后一个音符是C升调，不是C调，印刷有误）

接下来的那个冬天我是在宁静迷人的拉帕若海湾度过的，这个海湾离热那亚不远，它从沙瓦利和波尔多夫诺岬角之间切入陆地。那时我身体情况不是很好，那里的冬天又很冷，还雨水连绵。我住的小旅馆就在海边，夜晚的涛声使我整夜难以入眠，这家小旅馆几乎没有一样是令人满意的。尽管如此，这大致证明了我的话：一切意义重大的东西都产生于对逆境的抗拒。正是在这个冬天，在多么不利的条件之下，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诞生了。每天上午我都要沿着去往佐阿里的宽敞大道往南走，登上高处，穿过一片松树林，远眺大海；每天下午，只要健康状况允许，我就会绕着整个海湾从桑塔玛格丽塔走到波尔多夫诺岬角。这个地方和这里的风景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德

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非常喜欢的，因此也愈加深得我心。1886年秋，弗里德里希三世最后一次造访了这个被遗忘的令人欢心的小地方，那时我碰巧也回到了这片海滨。就是在这两条散步的道路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整个第一部分从我脑海里涌现了出来，尤其是查拉图斯特拉本人这个典型，更确切地说，在我散步途中，他向我袭来……

2

为了理解这个典型，人们首先必须要清楚他的生理学前提，也就是我所说的伟大的健康。对于这个概念最好、最具我个人特点的解释，莫过于我在《快乐的科学》第五篇最后一段做出的。我在那段里写道：“我们这些新人，无名的人，难以理解的人——指的都是同一种人——我们这些早产儿乃是那尚未呈现之未来的提前降生。对于一个新目标，我们也需要一个新手段，也就是一种新的健康，这是一种比以往所有健康都要更强壮、更聪敏、更坚毅、更勇敢、更快乐的健康。若是谁的灵魂渴望去体验迄今为止全部的价值追求和想望，渴望航行到理想主义之‘地中海’的全部海岸，若是有人想从自身最内在的各种各样体验出发，去体会实现理想和发现理想之人的心情，比如一位艺术家、一位圣人、一位立法者、一位贤人、一位学者、一位虔诚的信徒以及一位老式的神性隐士的心情，他首先必须拥有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伟大的健康。这是一种你不仅要拥有，而且必须不断努力要一而再再而三获取的健康，因为人们总是一再放弃它，不得不放弃……”

“我们这些理想的探险者如此这般长时间行进在人生旅途之后，勇气或许胜于谨慎，虽然经常触礁搁浅，受到损伤，但如前所述，我们变得比人能想象到的还要健康，健康得可怕，永不止息地健康。”

——由这健康我们获得的回报就是，好像直面一片尚未被发现的疆域，无人知道它的边界，这是迄今为止所有理想之大陆和视角的彼岸，那里有数不尽的美丽和怪奇，无穷无尽的疑惑之魅和无休止的诧异与神奇，这使我们的好奇心和占有欲如一匹脱缰之马，驰骋不已。
——天哪！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们如此满足了。

“有了这样的展望之后，怀揣如此这般的认知饥渴和不安心，我们何以还会满足于人的目前生活呢？对于人类这些最有价值的目标和希冀，我们还没有严肃当真看待过，而且了解之后或许也不想再多看一眼了，这已经够糟糕了，但也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是一种不同的理想，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它神奇、诱人，也充满了危险，我们不会劝说任何人去追求这种理想，因为我们无法轻易获知谁有这份资格和能耐：那是拥有特定精神之人的理想，这种人在该精神驱使下会自发地，也就是不由自主地凭借无比充实的内心世界和强力，去戏弄一切迄今被奉为庄严、卓越、不可触犯和神圣的事物；对他们来说，民众简单从中建构出价值尺度的那些高尚之物，就意味着危险、堕落、受欺压，或者至少也意味着松懈、盲从和一定时间段的丢失自我；他们的理想乃是人一超人般的幸福和幸福意志的理想，这种理想大多时候是以非人的方式出现，例如当它置身于世间整个迄今看重的事物中时，置身于表情、话语、声调、目光、道德和使命方面全部迄今推崇的事物中时，宛如这些事物的不情愿又要全力以赴的滑稽模仿一般。
——尽管这一切，伟大的严肃性或许正是由此才开始，真正的质疑正是由此才出现，灵魂的命运由此改变方向，时针开始转动，悲剧开始了……”

19世纪末，有谁对强大时代诗人们所谓的灵感有一个清晰概念呢？如若没有，那我就来描述一下。只要一个人身上还残留些许迷信，实际上他就几乎无法抛开那种认为人只是无比巨大力量的化身、代言人和媒介的看法。启示这个概念指的是，以无以言表的确凿和精细突然看到、听到了无比震撼和折服人心的东西。这样的描述无疑符合实际情况。人们听到，但不去寻找；人们接受之，但不问给予者；一种想法有如一道闪电出现，势不可挡，没有任何迟疑——不容你丝毫选择；这是一种狂喜，其巨大张力有时会令人热泪盈眶，狂喜之时，步伐会不由自主，时而飞奔，时而迟缓；这是一种全然忘乎所以的状态，但异常清晰意识到无数直达脚趾的细微的战栗与兴奋；这是一种幸福的深度，在那里最痛苦和最阴郁的东西不是作为对立面，而是作为前提，作为激发之物而出现，作为光艳四射下一种不可或缺的色彩而存在；这是一种竭尽形式之宽广空间的韵律本能——音长，这种对向远处无限延伸之韵律的需求近乎在丈量着灵感的威力，是对灵感之强力和张力的一种均衡……

一切都是最大限度地以不由自主方式发生，却犹如在一种自由感、势不可挡、强力和神性的风暴中发生……最令人瞩目的乃是形象和比附出现的不由自主性，这时人已经搞不清楚什么是形象，什么是比附了。一切都以最贴切、最正确、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用查拉图斯特拉的话来说，仿佛你关注的东西在自己走过来，供你去比附（——“在这里，万物都轻柔地向你走过来，殷勤地投入你话语中：因为它们想附在你背上一起前行；这里，你驾驭着每一个比附走向每一种真理；这里，全部隶属于存在的话语和话语神殿向你开启；这里，所有存在都想成为话语，一切成为都想向你学习如何诉诸话语——”）这就是我对灵感的体验；我毫不怀疑，人们必须回溯几千年，才能找到那个能对我说“这也是我的体验”的人。

那以后，我在热亚那患病卧床几个星期。接着，我在罗马度过了一个忧郁的春天，那里我算是勉强活了下来——真不容易。其实，罗马是地球上最不适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作者待的地方了，这地方让我受尽折磨，并不是我自己选的。我试图离开这地方，——我想去阿奎拉，那是一个与罗马完全不同的地方，是出于对罗马的敌意建造起来的。我也想有一天建造一个地方，来纪念一位高尚的无神论者和教会反对者，他是世上与我最有亲缘关系的人之一，那就是伟大的霍恩斯陶芬皇帝腓特烈二世^[75]。

可是，所有离开的尝试都失败了，我还是不得不回到罗马。最终，在我寻找一个反基督居住区而精疲力竭后，只能勉强自己住在了巴贝里尼广场^[76]。那里的难闻气味让我害怕，为了尽可能避开它，我还曾向德尔奎里纳莱宫^[77]打听，是否有一间适合哲学家居住的安静房间。刚刚提到过的巴贝里尼广场上方高处有一个柱廊，从那里可以俯瞰罗马城，倾听下面深处喷泉的流水声，就在这个柱廊里，我创作了那首我作品中最为寂寞的《夜歌》^[78]。那时，总有一个表达着无以名状忧伤的调子萦绕我耳边，我在这样的句式营造着这首调子的叠句“为了不朽而死去……”

夏天，我回到了查拉图斯特拉思想第一道闪电掠过我脑海的那个神圣地方，在那里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二部，十天就足够了，无论是第一部、第三部还是最后一部，我都没有多花时间。

随之而来的冬天，我到了尼斯^[79]，在尼斯晴朗的天空之下，我的生活中第一次照进了阳光，我开始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三部，——而且完成了，写完整本书所用时间几乎不到一年。尼斯风光中有许多隐蔽的角落和高地，那里我度过了众多难忘的时光。我曾

极为艰难地从车站攀爬到摩尔人居住的奇妙的山崖城堡，那个题为“旧石板与新石板”的关键章节^[80]就是我在攀爬的路上构思出来的。当我创造力喷薄而出时，我肌肉状态也总是最好的。身体受到了激发，就让“灵魂”靠边去吧。……那些日子，人们常常能看到我手舞足蹈的情形，我可以在山上连续攀爬行走七八个小时而全然不知疲劳。那时我睡得好，常常开怀大笑，整个人都身心愉快，耐心宽容。

5

除去如上所述那杰出的十天外，我在创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过程中，尤其是创作完成之后的那几年，日子过得异常艰辛。为了不朽，人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为此他要先在有生之年死过很多次才行。

有一种东西，我称为来自伟大事业的复仇，针对的是创作者。任何伟大的东西，无论是作品还是事业，一旦完成，立刻就会逆转成与创作者作对的东西，原因是：人做出了如此这般伟大成就后就会变得虚弱，——他不会再去做了，连看都不会去看了。那些人从来不应企及的事一旦做完，那些关乎人类命运的事一旦完成——这些事自此就会在你身上挥之不去！……几乎将你压垮……这就是伟大事业的复仇！

还有另一样东西是笼罩在身边的可怕的寂静，这样的孤独有着七层厚皮，什么都无法穿透它。你走到人群中，和朋友打招呼，这些都成了新的荒野，再也没有人投来目光问候你。往好处想，这也是一种抗拒，我曾经历过不同程度这样的抗拒，几乎是来自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没有什么比突然拉开距离更伤人的了。——得不到尊重就不知道如何活下去了，这样高贵的天性是少之又少的。

第三件事我要说的就是皮肤对微小刺激的荒唐的敏感性，即在一切小事面前束手无策。在我看来，这是由过度消耗抵抗力造成的，而抵抗力是人从事所有创造性活动，从事任何发自肺腑由衷想要完成之事的先决条件。从事这些活动时，细小的抵抗力储存立即被耗尽，而新的补充却没有再进来。——我还敢说，人的消化能力会变差，还会变得不愿意动，而且动不动就发火，甚至还会多疑，——这种多疑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体现了病原学上的某种错位。我在这样的状态里有一次由于回归到了更温和，与人更为友善的心绪中，感受到了一群牛在靠近，虽然还未看见，但给人温暖……

6

这本书绝对是独特的，它是从满满溢出的力量中创造出来的，基于如此溢满的力量去创作，那些诗人暂且不论，应该是史无前例的。我提出的“狄奥尼索斯”概念成了最崇高的事业，与其相比，人类所有其他事业都显得贫乏而有限。在这激情无比洋溢的高度，歌德和莎士比亚可能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呼吸了，将但丁与查拉图斯特拉放在一起比高低，但丁不过就是一位信徒，而不是第一位创造出真理，创造出统治世界的精神，创造出命运之人；《吠陀经》的作者是一群僧人，他们连给查拉图斯特拉脱鞋的资格都没有。这一切都是细枝末节，无法表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所具有的那种超群出众的巨大孤独感。查拉图斯特拉永远有权这样说：“我在自己四周画了一个圈作为一条神圣的界线，随着我越攀越高，进入这条界线的人就越来越少。我用自己登上一个比一个神圣的高山造起了一片山峦。”即便把所有伟大灵魂的精神和能耐合在一起，这一切加起来也产生不出一番查拉图斯特拉的言辞；他用来上下攀爬的梯子硕大无比，他比任何人都看得更远，想望更多，能做的也更多。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反驳，他是世上最在做肯定之事的人；他那里，所有对立都联结成一个

新的统一体了。人性中最高尚和最低劣的力量，最甜蜜、最轻佻和最可怕的东西都从同一个泉眼中流淌出来，稳妥有致，不慌不忙。在此之前，人们不知道什么是高度，什么是深度，更不用说什么是真理了。查拉图斯特拉对真理的披露绝对没有任何人做到过，就连伟大人物中也未曾有人做到过。在查拉图斯特拉之前，世上没有任何智慧，没有对灵魂的探究，也没有说话的艺术。在他那里，最切近的东西，最日常的东西都在诉说着闻所未闻的事物。话语因激情而颤动，雄辩成了音乐；光焰射向迄今没有猜度过的将来。跟语言回归其自然状态下的形象性比起来，迄今所有比喻的最强大威力都显得平乏，都是儿戏。

请看，查拉图斯特拉是如何从高处走下来，向每个人道出最有用的东西！他是如何用温柔的双手去抚握他的敌人，那些教会僧人，并与他们一起受苦！这里，常人无时无刻都在被克服，“超人”这个概念成了至高的现实。——人身上迄今被称为伟大的所有东西都无比遥远地位于超人之下。平和的光辉，轻快的脚步，无所不在的怨恨和超级勇气，以及所有一切对查拉图斯特拉来说典型的东西，从没有被作为伟大之所在而梦想过。查拉图斯特拉恰恰在那里感受到了自己的天地，在走向对立物中感受到了所有此在的最高存在方式。当你听到他是如何定义这个存在方式时，就不会试图去寻找可与他匹配的人了。

这是拥有最长梯子能下沉到最深处的那种灵魂，

这是最广博的灵魂，能在自身中最远地奔跑，迷失和漫游的那种灵魂，

这是最出于必然的灵魂，由兴之所至而必然会闯进偶然之中，

这是想要成为什么的活生生的灵魂，它想要和刻意要拥有什么，

这是摆脱了自己又在最广袤程度上复得自己的灵魂，
这是蠢人用最甜蜜话语能说动的最睿智的灵魂，
这是最自爱的灵魂，万物因其都会出现顺流逆流、潮涨潮落
的那种灵魂。[\[81\]](#)

而这里指的就是狄奥尼索斯本人，——另一种考量也会导向这一点。查拉图斯特拉这种类型内蕴的心理学难题是：对迄今为止人们认可的一切东西不仅空前程度地说不，而且也是这么去做，这样的人又何以具有肯定精神；一个肩负命运之重荷，使命之厄运的人，何以又是最轻快和最超然的——查拉图斯特拉是一位舞者——他对现实有着最为不顾人们感受，最为可怕的洞见，思考出了“最为幽深的思想”，尽管如此，他由此看到的并不是对此在的抵制，根本不是对此在之永恒轮回的抗拒，而是看到了对一切事物进行永恒肯定的理由。“这巨大的无限肯定和祝福”……“我还将我的祝福和肯定带到一切深渊之中”[\[82\]](#)……这里指的又是狄奥尼索斯了。

7

这样一个精灵孤自跟自己说话时用的是什么语言呢？酒神颂歌的语言，我是这酒神颂歌的发明者。人们听到了查拉图斯特拉在《日出之前》（第三部，第18页）是如何自言自语的，在我之前，还没有人能將这样一种绿宝石般的幸福，这样一种神性的温柔用嘴说出来，就连这位狄奥尼索斯最深沉的忧郁，也会变成酒神颂歌。我以《夜歌》为例，这是一种永恒的哀叹：由于拥有着太多的光和力，由于其太阳本性，注定不能去爱。

夜来了：现在所有泉眼喷涌的声音更大了，我的灵魂就是一眼喷涌的泉。

夜来了：现在所有爱者的歌声开始响起，我的灵魂就是一首爱者之歌。

我心里有一个静不下来，也不会静下来的东西，它要发出声响；我心里有一种爱的渴望，它自己在说着爱的话语。

我是光，唉，要是我是夜就好了！可是，光包围着我，这是我的孤独。

唉，要是我这里没有光，是夜色就好了！我多想吮吸光的乳汁！

还有你们，闪耀的星星和天上的萤火虫，我要祝福你们！——你们赠予的光使我感到快乐。

可是，我生活在我自己的光里，我饮回从我自己身上发出的光焰。

我没有体会过获取者的幸福，我常常梦想，窃取一定比获取还要幸福。

我的手从未停止过赠予，这就是我的贫穷；我看着期待的眼神和充满渴望的被照亮的夜，这就是我的妒忌。

呵，所有赠予者都有的不幸啊！呵，我的太阳要求的昏暗啊！呵，对渴望的欲求啊！呵，饱食时还有的嫉妒饥饿啊！

他们从我手上获取：可是我还会触碰到他们的灵魂吗？在给予和获取之间是有一道鸿沟，而最小的鸿沟最后也要去消除掉的。

从我的美中生出一种饥饿：我要让那些被我照亮的人有痛苦，我要从受我施与的人那里再去夺回，——我就这样渴望作恶。

你们迎面伸出手来，我会缩回手，宛如瀑布下落时也会有迟疑一般——我就这样渴望作恶。

我的充实图谋这样的报复，从我的孤独涌出了这样的诡计。

我对赠予的快乐在赠予行为中消逝，我的道德因充溢而变得厌倦它自己。

总是不停在赠予的人，其危险在于丧失羞耻感；总是不停在分发的人，他的手和心会由于不停分发而变得麻木。

我的眼睛不再为乞求者在害羞而流泪；我的手已经变得太坚硬，不再能感受那获取满满之手的颤动。

我眼里的泪水，心上的软毛，都到哪里去了？呵，一切赠予者的孤独啊！一切照耀者的沉默啊！

众多太阳绕行于寂寥的天际：它们用光亮对一切黑暗之物说话——对我却沉默不语。

呵，这是光对照耀者的敌意，它无情地变换自己的轨道。

在内心深处对发光者不公，冷酷对待众多其他太阳——每个太阳都在这样运行着。

太阳宛如一阵风暴改变着他们的轨道，它们遵循着它们自己坚强的意志，这就是它们的冷酷。

呵，你们这些黑暗者，你们这些夜者，只有你们才从光照者那里截取到温暖！呵，只有你们才从光的乳房上吸取到奶汁和养分！

呵，我的周围全是冰，我的手在寒冰上烧焦！呵，我心怀焦渴，它渴求你们的渴望！

夜来了：呵，我是光，必须这样！可我渴望夜晚的一切，而且孤独！

夜来了：现在我的渴求就像一道泉水喷涌而出——我渴望说话。

夜来了：现在所有泉眼喷涌的声音更大了，我的灵魂就是一眼喷涌的泉。

夜来了：现在所有爱者的歌声开始响起，我的灵魂就是一首爱者之歌。

8

这样的诗句从没有人写出过，传达的感受从没有人有感到，此等的郁闷从没有人拥有过：只有一个神，只有狄奥尼索斯经历过这些。这是对太阳在光里出现孤独感的一首酒神颂歌，阿里阿德尼^[83]应该是对这样一首颂歌的回应所在……阿里阿德尼是什么？除了我之外有谁还知道！……所有这样的谜团迄今没有人能解，我甚至怀疑是否曾有人在此唯独看到谜团。——查拉图斯特拉曾严格规定了自己的使命——这也是我的使命——，因此人们在这一点上不会理解错，也就是说，他是肯定者，哪怕要去为此据理力争，要去救赎一切已然逝去者。

我游走于人中间当作是游走于未来之碎片中：我在观望那未来。

把这些碎片，谜团和可怕的偶然收集起来，合成一体，这是我全部的创造和努力。

如果人不是创造者，不是解谜者和偶然性的救赎者，那我如何能忍受成为人呢？

对已然逝去者进行救赎，把一切“过去是那样”变为“那正是我想要的”——这在我看来才叫救赎。^[84]

在书的另一处，查拉图斯特拉尽可能严格规定了只对他本人来说，“人”能是什么——既不是爱的对象，也不是同情的对象——甚至对人的巨大厌恶，查拉图斯特拉也已抑制住：对他来说，人就是一种未定型之物，一块材料，一块需要去雕琢的丑陋的石头。

不再去欲求，不再去估测，不再去创造：呵，让这些巨大的倦怠永久远离我吧！

即使在认知行为中，我也只感受到我意志的生产和生成兴致。假如说由认知获取的知识里出现有天真无邪，那也是因为该知识里有生产意志——在。

引诱我离开上帝和诸神的就是这种意志；如果有诸神在，那还有什么要创造的呢？

而不断驱使我走向人的则是我那炽热的创造意志，它就这样驱使锤子砸向石头。

呵，你们人类啊，那石头里有一个形象为我而沉睡在那儿，这是那无以取代的特定形象！呵，它必须沉睡在那块异常坚硬、丑陋无比的石头中！

现在，我的锤子对着这个形象的牢墙残酷敲击，石头上碎石溅飞：对此我何须介意！

我要完成这项工作，因为我曾看到一个影子向我走来——那是万物中最静逸、最轻盈的东西。

超人之美作为影子向我走来，呵，我的弟兄们，诸神还与我有什么相干！……[\[85\]](#)

上面突出的那句诗促使我强调最后一点：对狄奥尼索斯的使命而言，坚硬的锤子，进行毁灭的兴致，都是决定性的前提条件。“你们

要坚强”这个祈使句，最深地坚信“所有创造者都是坚强的”，是狄奥尼索斯本性的真正标志。——

[71] 希瓦尔波拉纳湖位于瑞士上恩加丁山区。

[72] 维琴察是意大利威尼斯西部的一个小镇。

[73] 长生鸟（Phoenix）系古埃及神话中的不死鸟，相传自行焚死后会在灰烬中再生。

[74] 莎乐美（Lou von Salomé, 1861—1937），俄罗斯流亡贵族，作家，与欧洲知识界多位名人有来往，包括尼采、里尔克、弗洛伊德等。尼采曾于1882年向她求婚，但遭到拒绝。

[75] 腓特烈二世于13世纪中叶在意大利中部建造了阿奎拉这座城市，抵御教皇势力的扩张。

[76] 巴贝里尼广场（Piazza Barberini）是罗马市中心的一个大型广场。

[77] 德尔奎里纳莱宫（Palazzo del Quirinale）是罗马的一个著名宫殿，现为意大利总统府。

[78]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第31节。

[79] 尼斯系法国南部城镇，毗邻地中海。

[80]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第56节。

[81]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旧石板与新石板》。

[82] 这两处出均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日出之前》。

[83] 阿里阿德尼（Ariadne）系希腊神话中克利特王之女，与提修斯（Theseus）相爱，曾给他一个线团，帮他逃出了迷宫。后来她被提修斯抛弃，嫁给了酒神狄奥尼索斯。

[84]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拯救》。

[85]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在幸福的岛屿上》。

《善恶的彼岸：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

1

我接下来几年的工作已经极其严密地预先作了描述，我使命中的肯定部分已经完成，接下来轮到言说和实施否定部分了：重估迄今为止的各种价值本身，此乃一场伟大的战争，——它唤起决断的那一天。这里包含着慢慢环顾四周，寻找同道中人，寻找出于自身的强大能在毁灭方面助我一臂之力的人。——从那时起我所有著作都是钓钩：或许我就将自己当成擅长垂钓之人呢？……要是没有钓到任何东西，那么问题不在于我，而是因为根本无鱼可钓……

2

从根本上讲，这本书（1886年）乃是一种现代性批判，包括对现代科学、现代艺术甚至现代政治的批判，它同时指向了与现代正好相反、一点也不现代的那种类型，一种高贵的、从事肯定活动之人。就高贵且肯定这意义而言，这本书是用于培养贵族的，这个贵族概念要比以往人们理解的更具精神性，更加激进。哪怕只是面对这个概念，人身上也要具有勇气，也要能无所畏惧……这个时代引以为豪的一切东西都会被视为与这种人相悖的，几乎会被当作不好的行为，比如享

誉天下的“客观性”，“对所有受苦者的同情”，对陌生趣味卑躬屈膝和对细枝末节点头哈腰的“历史感”以及“科学性”。

如果考虑到这本书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写成的，那么，人们或许能猜到这本书的诞生要感谢的那种营养食谱。本来已经习惯了无论如何要看向远方的眼睛——查拉图斯特拉甚至比沙皇看得更远——现在被迫要去仔细看清楚手边的、当下的和周遭的一切事物。在所有方面，尤其是形式上，人们都会发现对各种本能的同一种刻意背离，而查拉图斯特拉正是基于这些本能才成为可能的。人们看到的是在形式、意图和沉默方面的完美精致，而心理方面的东西则遭到了强硬和冷酷的对待，——这本书没有一个温和的字眼……所有这些都在于休养：到底有谁能猜到，这样一种对查拉图斯特拉此等财富的浪费需要有怎样的休养？……用神学上的话语来说——请听好，因为我很少以神学家的姿态来说话——，上帝在完成了他好几天工作之后变成一条蛇躺在知识大树底下时，那还是上帝吗？他这样是在从上帝中恢复出来……他已经将万物造得太美好了……魔鬼只不过是每逢七天在休闲时的上帝……

《道德的谱系：一本论战著作》

就表达、意图和造成惊异的方式而言，组成《道德的谱系》的三篇文章也许是迄今为止最骇人听闻的了。人们知道，狄奥尼索斯也是黑暗之神，——每篇文章的开头都故意将读者引入歧途，冷静而不动声色，就事论事客观论说，甚至还带有嘲讽，故意摆出姿态，又欲言又止。渐渐地，平静一点一点被打破，时不时有闪电划过，让人十分不快的真理带着沉闷的隆隆声从远处滚滚而来——在最终达到极速时，一切事物都以巨大的张力向前奔逐。每篇文章最后，在绝对骇人的霹雳声中，某个全新的真理从厚厚的云层里呈现出来。

第一篇文章的真理是基督教心理学：基督教是从怨恨精神中诞生的，而不像人们以为那样源自某种“精神”——就其本质而言是反动的，它是对高贵价值之统治地位的巨大反叛；第二篇文章讲的是有关良心问题的心理学：良心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人心中上帝的声音”——它是一种残酷本能，在不能向外宣泄时，就掉过头来转向自己。这里，残酷作为最古老、最不可或缺的文化根基之一，首次得以昭示；第三篇文章旨在回答以下问题：虽然禁欲主义理想和教士理想是极为有害的理想，是一种求毁灭的意志，一种颓废理想，但它们何以具有如此巨大威力，答案是：并非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由于上帝在教士背后坐镇，而是人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禁欲主义理想和教士理想拥有巨大威力的原因是，它们是迄今为止唯一的理想，没有什

么可与之匹敌，“人们宁愿要虚无，也不愿意连要都不要了”……
主要是，在查拉图斯特拉出现之前，缺少一种对立的理想。

你们应该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这是一位心理学家为重估一切价值而作的三篇决定性前期作品，——书中包含着第一部有关教士的心理学。

《偶像的黄昏：如何用锤子进行哲思》

1

这本不到150页的书，语调轻松，但充满震撼，好似恶魔在大笑。——这本书是在很短时间内写成的，短到我不知道要不要说具体天数。就这样一本书可谓绝无仅有的著作了：没有哪本书比它拥有更多的实质性干货，没有哪本书比它更独立、更具有颠覆性、更凶恶。如果有人想快速了解在我之前一切是如何头足倒置的，那可以从这本书开始。扉页上所说的偶像，不过是一向被称作真理的那些东西。偶像的黄昏——用德语句式来表述就是：旧的真理已经走到尽头……

2

没有任何现实存在和“理想性”是这本书没有触及的（触及是一个多么委婉的用语啊！……），不仅那些永恒的偶像，还有那些最新因而最幼小的偶像，比如“现代观念”。一阵强风吹过树林，到处都落下来果实，也就是真理。人们行走时被满地真理绊倒，甚至会踩烂一些——它们实在太多，这着实是对这个无限富饶之秋天的浪费。……但是人们已经拿在手上的，那就丝毫没有可质疑的了，那是作出的决定。唯有我将判断“真理”的标准拿在手上，我是第一个能就真理作出决断的人，仿佛我身上生出了第二意识，仿佛我身上的

“那个意志”点燃了一道光，照亮了自己至今一直在走的下行之路……就是这条下行之路人们还称之为通向“真理”之路……现在，一切“迷糊不清的冲动”都结束了，那些好人恰恰是最不可能意识到正确道路的……正经而言，在我之前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向上的道路：从我开始，人们才又找到了希望，使命和文化引领之路——我就是传递这些东西的快乐使者……正因为此，我也是命运。

3

写完这本书之后，我一天都没耽搁，马上就着手《重估一切价值》的伟大工作，怀着一种无与伦比的、独有的自豪感，每时每刻都确信自己的不朽，凭着对命运的深信不疑，我在铜板上刻下一个又一个字符。1888年9月3日我完成了前言：那天早上写完前言后，我走到户外，看到了我在上恩加丁见到的最美好的一天——清澈透明，色彩斑斓，北国冰雪和南方温煦之间的对立全部消失，融为一体。

为洪水所阻，我9月20日才离开希尔斯-马里亚，最后我居然成了这个美妙地方的唯一客人。对于这个地方，我要感谢一个不朽名字的馈赠。在经历了一段有诸多意外事件，甚至在科莫这个洪水泛滥之地（我是深夜才抵达科莫这个地方的）出现生命危险的旅途之后，我于9月21日下午抵达都灵，这是适合我的地方，从那以后我就定居在都灵。我又住进了那间春天时住过的同一间公寓，即卡尔洛·阿尔贝托大街6号3室，正对着宏伟的卡利尼亚诺宫，那是维多利奥·埃曼努埃莱^[86]的诞生地。从我房间可以看到卡尔洛·阿尔贝托广场，越过广场可以看见远处的小山丘。不让自己有一刻分心，我毫不犹豫重新投入写作，还有最后四分之一需要完成。终于在9月30日大功告成，写完了《重估一切价值》，那一天还出去沿着波河悠闲散步，就像创世第

七天的上帝一样。同一天，我还写完了《偶像的黄昏》的前言，对该书校样的修订是我9月里令人放松的一件事。——我从未经历过这样一个秋天，也从来不认为有可能完成人间的这样一些东西——就像克劳德·罗兰^[87]的作品那样令人有无限遐想，每天都有着无限美好。

^[86]埃曼努埃莱（Vittorio Emanuele II, 1820—1878），意大利统一后的首任国王。

^[87]罗兰（Claude Lorrain, 1600—1682），法国风景画家。

《瓦格纳事件：一个音乐家的问题》

1

要想正确对待这部著作，就必须去感受令人痛楚的音乐命运，好似感受一道未愈伤口的痛。——如果我在感受音乐命运令人之痛，那么痛在何处呢？痛在音乐已经失去了其美化世界进行肯定的特征——它变成了颓废之音而不再是狄奥尼索斯的笛声了……但你若如此这般地去感受音乐，就好像那是你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是你自己所遭受的痛，那你就会觉得这部著作顾虑满满和过于温和。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到轻松明快而且在善意嘲讽的同时也嘲讽下自己——在实话实说会让任何一种严酷都显得合适的地方，笑着说出自真的真话——这本身就是一种人道。

我作为一名老炮手，其实轻而易举就能将大炮对准瓦格纳，有谁怀疑这一点呢？——这个问题中决定性的东西我一直藏在心里没说——我曾经热爱过瓦格纳。毕竟，我使命的意义和路径在于去抨击那个更狡猾、不易猜到的“未明者”——呵，我要去揭露的不是音乐中的卡里奥斯特罗^[88]，而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未明者”——当然，还要去抨击德意志民族，这个民族在精神方面已经变得越来越懒散，精神本能也变得越来越贫瘠，这个民族带着一个足以令人羡慕的好胃口在前行，以矛盾事物为食，把“信仰”连同科学性，把“基督的爱”

连同反犹主义，权力意志（建立“帝国”的意志）连同卑贱者的福音，一股脑儿全吞下去了，竟然还没有消化不良……

在对立物中不选择任何一方！好一个中立的胃口和“无我”呵！德国人这公正的味觉，它对所有东西都一视同仁——觉得一切东西都美味可口！……毫无疑问，德国人是理想主义者。……我上次到德国时发现，德国趣味正在努力赋予瓦格纳和萨金恩号手以平等地位。我自己曾目睹，为缅怀一位真正的德意志音乐家——我是在过去意义上使用德意志一词，而不是在德意志帝国意义上——海因里希·舒茨大师，人们在莱比锡成立了李斯特协会，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推广机巧的教会音乐……毫无疑问，德国人是理想主义者……

2

可这里没什么能阻挠我冒昧地告诉德国人几个不悦的真相，要是我不说，还有谁会说呢？——我要说的是德国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随心所欲。我要说的是，德国历史学家们完全失去了判断文化进程和文化价值所需的宏大视野，他们个个成了政治（或教会）的附庸：他们甚至还不允许这种宏大视野出现。一个人必须先是被“德意志的”，必须先属于这个“种族”，然后才可以就历史上的一切东西断言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无价值的——并将这断言做成定论……“德意志的”就是论据所在，原则是“德国，德国高于一切”，日耳曼人成了史上“世界人伦秩序”所在。与罗马帝国相比，他们是自由的捍卫者；与18世纪相比，他们是道德，即“绝对命令”的复兴者……现在出现了一种德意志帝国的历史编纂学；我担心，甚至还有一种反犹太主义的——还出现一种宫廷的历史编纂学，冯·特赖奇先生真是不知羞耻呵……

最近，有个史学上的愚蠢判断，经过德国各家报纸的扩散，四处流传，成了每个德国人都会赞同的“真理”，这个判断出自幸亏已故的施瓦本美学家费舍尔^[89]之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只有二者一起才形成一个完整体——美感的再生与伦理的再生。”——听到这一说法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我忍不住要跟德国人说，甚至觉得有义务要告诉他们，他们都要对什么事负责。他们要对文化上四百年的全部重大阻遏负责呵！……而且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出于他们内心深处不敢面对现实的心态，也就是不敢面对真相，出于他们那已然成为本能的不顾事实之态度，出于理想主义……正是德国人使欧洲失去了文艺复兴这最后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硕果和意义，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那时，更高的价值秩序，也就是崇高的，肯定生命，拥有未来的价值正好取代并战胜了那些对立的，没落的价值——还深入人心！而路德这个可恶的教士，把教堂又重建了起来，而且更糟糕的是，重建的是基督教教堂，那时基督教已经奄奄一息……基督教，此乃宗教上对生命意志的否定啊！……路德是一位不可思议的教士，他先是“不可思议”地攻击了教会，后来又重建了教会……天主教徒们应该有理由来庆祝路德节，创作路德戏剧……路德——以及“伦理的再生”呵！让所有的心理学见鬼去吧！——毫无疑问，德国人都是理想主义者——

有两回，当德国人凭借巨大勇气和超越自我达到了一种正确的、明白无误而完全科学的思维方式时，他们以为找到了通向以往“理想”，通往融合真相与“理想”的秘密路径，其实找到的是拒斥科学，允许说谎的借口。莱布尼茨与康德，这两个人是欧洲实现理智诚实的最大障碍！——最终，在横跨两个颓废世纪的桥梁上出现了一股天才与意志的巨大力量，这股力量大到足以将欧洲融为一体，建立一个政治与经济的统一体，进而建立一个全球政府。而这时，德国人却用他们的“独立战争”使欧洲丧失了意义，丢失了拿破仑创造的宏大奇迹所拥有的意义。

因此，德国人对过去发生以及今天存在的一切负有责任，比如现今存在的极端反文化的病症和非理性，民族主义这种使欧洲患病的民族神经官能症，还有永恒化了的小国欧洲，即小国政治。对于这一切，德国人负有责任，他们使欧洲失去了本来有的意义，失去了本来拥有的理性——他们把欧洲带进了一个死胡同。——除了我之外，还有谁知道走出这条死胡同的路吗？……除了我之外，还有谁知道把欧洲各民族重新连在一起的伟大使命吗？……

3

还有，为什么我不可以表达一下我的疑虑呢？德国人在我看来还是会不懈努力，让一个宏大命运中最后只产出一只小老鼠来。迄今为止，他们对我一直在妥协，我怀疑，他们以后会做得更好些。——呵，这里我多希望自己是一个糟糕的预言家啊！……

现在，我的天然读者和听众是俄罗斯人、斯堪的纳维亚和法国人——他们会一直如此吗？——人类知识史上记载的德国人，都是些似是而非的名字，在这个知识史上出现的德国人总是只有这样一些“无意”的骗子（费希特、谢林、叔本华、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都应被授予这样的称号，还有康德和莱布尼茨，所有这些都只不过在制造面具而已）。这些人永远不应享有这样的荣誉，即作为德国精神而被看成是人类精神史上第一个正直的精神，此乃用真理对四千年来的欺骗做出判决的精神。

这个“德国精神”对我来说就是不良空气。心灵污浊已成了德国人的本能，这在他们说出的每句话，做出的每种面部表情中都有体现，靠近这样的污浊我便无法呼吸。德国人根本没有像法国人那样经历过17世纪严酷的自我反省，一个拉罗什夫科^[90]，一个笛卡尔，都

要比那些杰出的德国人正直一百倍，——德国人至今都没有一位心理学家，而心理学几乎就是判断一个种族是否洁净的标准所在……一个人如果心理上有不洁，他又怎么会有深度呢？面对德国人几乎就像面对女人一样，你在他们那里永远触不到底，因为他们没有底，这就是原因的全部所在。但这一点并不表明他们是肤浅的。

在德国称为“深”的东西正是我刚刚谈到的那种在自我问题上的污浊本能，也就是说，不想清楚了解自己。我难道不应该建议将“德国的”一词作为描述这种不良心理的全球通用词吗？比如，德国皇帝刚刚声称，解放非洲奴隶是他的“基督教责任”，而我们这些其他地区的欧洲人就直截了当地将这称为是“德国的”……德国人有曾写过任何一本有深度的书吗？他们甚至连什么叫一本书的深度都不知道。我有认识一些学者认为，康德是有深度的。我担心，在普鲁士宫廷会有人认为冯·特莱齐克先生是有深度的。有次我还碰到过这样的德国大学教授，在我赞誉司汤达是有深度的心理学家时，他们问我这个名字怎么写……

4

现在，我为什么不该把话说完呢？我喜欢干净利落。我努力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名蔑视优秀德国人的人。26岁时，我就曾表现出对德国人性格的抵触（见《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三篇，第71页），也就是说，德国人对我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让我设想一种所有本能都与我相悖的人，结果总是德国人。

我“考察”一个人时，首先要看他是否对差距有感觉，是否能看到人与人之间无处不在的等级、地位和秩序，还有是否卓越高贵。有

了这些，这个人就是出众之人，否则，只能归为和善、温顺的庸人之列。而德国人就是庸人——呵，他们是如此地温顺……

与德国人交往实际是在自降身份，也就是说，对德国人而言，一切都是相同的。……除去与几位艺术家，尤其是与理查德·瓦格纳的交往不算，与德国人在一起，我没有舒适过……要是有人说数千年来最有深度的精神出现在德国人那里的话，那么，朱庇特神庙里无论哪位女救主都会发声，她们那非常丑陋的灵魂至少也要受到同等对待……对这个种族我无法忍受的是，与他们在一起你会始终感觉不舒服，他们感受不到细微差别，——真不幸啊。我就是这样一个细微差别所在。

德国人脚底没有任何灵气，他们甚至都不会行走……德国人根本没有脚，他们只有腿……德国人丝毫不知道，他们是多么心狠，单就一点就已经够心狠的了，——他们丝毫不知道，要以身为德国人为耻……他们对什么都插嘴发表意见，他们自以为可以决断一切，我担心，他们甚至对我也在做决断……

我自己的整个生活就是如上所述话语的一个明证，我这里丝毫没有经历过他们曾用心、细致地对我。犹太人是这样的，德国人从没有。我的性情驱使我去温和友好地对待每个人，我可以做到不加区别地对待每个人，也就是说，这不会妨碍我认真观察。我不会忽略任何人，至少对我的朋友是如此，——毕竟我希望，这一做法体现出我对他们有人情味！至今有五六件事让我一直引以为荣。——尽管如此，多年来我收到的几乎每一封信都会让我有种感觉，里面有着犬儒主义式的冷嘲热讽，但对我更多是善意的嘲讽，而不是憎恨……我都当面跟我的每位朋友说，一点没有必要去研读我的著作。其实，我已经从一些极其微小的细节看出，他们根本读不懂我著作里写的是什么。就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言，除了看到毫无根据、幸好无关紧要的狂妄之外，我的朋友中有谁还看到更多的东西吗？……

十年过去了，人们对我展示了荒唐的沉默，在这期间，没有一个德国人感到内疚而站出来捍卫我被埋没的名字，第一个站出来这样做的是一位外国人，一位丹麦人，他满怀敏锐的本能和无畏的勇气，对我那些所谓朋友们表示了愤慨……去年春天，乔治·布兰德斯博士在哥本哈根的大学里专门开课讲授我的哲学思想，这再次充分证明了他是一位心理学家。如今，在德国的哪一所大学会出现这样的事呢？——我自己从来没有因此而痛苦过，凡必然发生的事都不会对我造成伤害，热爱命运是我最内在的本性。可是，这并不妨碍我热爱嘲讽，尤其是热爱史无前例的嘲讽。

因此，大约在那道惊天动地的重估一切价值之雷电出现的两年
前，我推出了《瓦格纳事件》，德国人再次一如既往地攻击我，妄图使自己永垂不朽！他们正好还有时间这样做！——目的达到了吗？——为你们高兴，我的日耳曼先生们！让我来恭维你们一下……对的，再提一下我的朋友们。刚刚还有一位我过去的女友写信告诉我，她此时正在嘲笑我……而且，这件事发生在我正肩负着不可言喻的责任的时刻，——这一刻恰好是我太需要温柔话语，太需要崇敬眼神的时刻，因为我正肩负着人类的使命。——

[88] 卡里奥斯特罗 (Cagliostro, 1743—1795)，西西里大骗子。

[89] 费舍尔 (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 1807—1887)，德国美学家。

[90] 拉罗什夫科 (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 1613—1680)，法国作家，著有《道德箴言录》。

四 为什么我是命运

1

我清楚自己的命运，总有一天，我的名字会让人想起一些可怕的事情，——想起那世上前所未有的危机，想起那最深层的良知冲突，想起那断然的号召，去反对迄今被信奉的、被要求去做的和神圣的一切东西。我不是人，我是炸药。

尽管如此，我身上没有一丝要去创建某个宗教的气息——宗教是下层民众的东西，每次与宗教人士接触后，我都得洗洗手……我不需要任何“信徒”，我觉得自己太有恶意，以致自己都无法信自己。我从来不与大众说话……我非常害怕自己有朝一日被当成圣人：你们应该能猜到，我为什么提前出版这本书了，为的是要防止有人对我做出不合适的事情……我不想成为圣人，宁愿做一个小丑……也许我就是一个小丑……尽管如此，或者宁可说就算不是如此——因为迄今为止没什么比圣人更虚伪——我说的都是真理，——但真理是可怕的，因为迄今为止谎言都被当成了真理。

重估一切价值：这是我对人类进行最高层面自我反省的简要表述，这种反省已经成为我的血肉和天赋了。我的命运决定了我必须成为第一个正派的人，要与数千年来的虚伪作对……我是第一个发现真理的人，由此我第一个看到了谎言之作为谎言的问题所在——我嗅到了这一点……我的天赋在我的鼻孔里……我质疑一切从未被质疑过的东西。

尽管如此，我还是否定精神的那个对立面。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福音传递者，我知道那迄今还无人清楚的使命，直至我出现后，人类才又重获希望。基于这一切，我也必定是那带来剧变之人，因为当真理与数千年的谎言一战时，无法想象的各种剧变会出现，会有大地震颤而来的痉挛，会出现地动山摇。这样，政治这个概念会完全上升到精神层面的战争，旧社会的一切权力结构都会分崩离析——这些权力结构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由此会发生各种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战争。从我开始，世界上才有伟大的政治。——

2

假如有人想读到对怎样的命运可以使人成为人的扼要表述，可以在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找到它。

要想在善与恶方面成为一名创造者，必须先成为一名否定者，去灭除各种价值，

也就是说，最高的恶乃是那最高的善的一分子，是那创造性的善的一分子。[\[91\]](#)

从许多角度看，我都是有史以来最令人恐惧的人，但这并不妨碍我成为最具善心的人。我否定的力量有多大，否定的兴致也就有多高，——在这两方面，我都遵循自己的狄奥尼索斯本性。这个本性深知，行为上的否定与目标上的肯定是一体的。我是第一个非道德论者，因此是一位杰出的否定者。——

3

有个人们还没问但应该问的问题：在我这第一个非道德论者看来，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名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让这个波斯人在历史上显得独特无比的东西恰是非道德论的反面。在善与恶的争斗中，查拉图斯特拉第一个看到了真正让万物运转的驱动轮，也就是说，他的成就在于：将道德看成是形而上的东西，看成力量、缘由以及目标本身。但上面这样来提问其实已经给出答案了。

查拉图斯特拉创造出道德这个灾难十足，将人引入误区的东西，结果是，他就必须成为第一个看出这是误区的人，这不仅仅因为他在这方面比任何一位思想家花的时间更长、经验更丰富，——整个历史实际上都是对所谓“世界伦理秩序”的实验性逆反——，更重要的是因为查拉图斯特拉比任何一位思想家都更尊重真理。他要教人的东西就是将尊重真理视为最高德性，这也唯有他如此。这一点与“理想主义者”不敢面对现实的胆怯正好相反，他们一遇到现实就逃跑。查拉图斯特拉身上拥有的勇气比其他所有思想家加在一起的还要多，讲真话并善于攻击，这是波斯人的美德。——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道德依循真理进行自我克服，道德论者通过变成对立面进行自我克服——也就是变成我——这就是我口中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名字的含义。

4

根本上讲，我所谓的非道德论者一词包含着两重否定：一者，我否定的是迄今为止被奉为最高尚的那一类人，也就是善者、好心者和做好事者；再者，我否定的是那种成为道德本身并行使主导的那种道德，也就是颓废的道德，具体来说就是基督教道德。可以说，第二重否定更有决定意义，因为总体而言，将善行和好心行为过分抬高在我看来就是颓废引发的结果，是衰竭呈现出的征兆，与上升和进行肯定的生命不相容：否定和毁灭是肯定的前提。

我先谈谈善良人的心理吧。为了评估某类人的价值，就要计算他们维持生存所需的成本，也就是说，必须了解他们的生存条件，而善良人的生存条件就是谎言，换句话说就是，无论如何都不想看到现实情况实际是怎样的。这样无视现实的真实情况不是为了随时激发出好心的本能，更不是为了让只知道关注当下的好心肠人随时来介入。把各种各样的不良状态都视为障碍，视为某种必须消除的东西，这种做法愚蠢至极，总体而言，会引发真正灾难性后果，导致愚蠢的命运，几乎会蠢到为使广大穷人免遭其害而要取消恶劣天气的地步……

从宏观的总体经济学角度看，可怕的现实（存在于激情、欲望和权力意志中）要远远比任何形式的微小幸福，所谓“好事”更符合必然性。由于这“好事”是以蒙蔽本能为前提的，人甚至必须很宽容才会给它留出一席之地。我会极力去指明，乐观主义这一乐观之人的怪胎对整个历史造成的极为可怕的后果。查拉图斯特拉第一个认识到，乐观主义者跟悲观主义者一样颓废，甚至可能危害更大。他说道：“好人从来不讲真话，他们教给你们的海岸和安全地带都是错的，你们在他们的谎言中诞生并受到了这谎言的庇护。这些好人使一切都从根本上受到蒙蔽和扭曲。”^[92]

幸好，建立这世界不是要对付本能的，以至于只有温顺的群居动物才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狭隘的幸福。要求所有人都要成为“好人”，群居动物，天真无邪的，好心的，“美丽心灵”，或者像赫伯特·斯宾塞^[93]希望的那样，让所有人都成为无私的人，那就等于剥夺了此在之人拥有的伟大特性，等于在阉割人类，并把所有人都变成一帮可怜兮兮的中国人。——可是，人们已经这样尝试过了……正是这样的尝试人们称之为道德……在此意义上，查拉图斯特拉有时将好人称为“末位之人”，有时称为“走向终结的开始”，尤其是，他将好人看成是最为有害的一种人，因为他们的存在不仅以牺牲真理为代价，也以牺牲未来为代价。

好人，他们不会创造，他们永远是走向终结的开始。

他们把在新石板上写下全新价值的那人钉在了十字架上，

他们将自己的未来祭献了出去，他们将所有人的未来都钉在了十字架上！

好人，他们一直就是走向终结的开始……

不管世界的诽谤者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好人造成的伤害乃是最为严重的伤害。[\[94\]](#)

5

查拉图斯特拉是有关好人的第一位心理学家，结果成了恶人的一位朋友。如果一个颓废类别的人上升成了最高等次的人，那么，这一定是牺牲了其相反类别人的高位等次，也就是牺牲了那维护生命之强人的等次。当群居动物闪耀出至纯德性光芒时，不这么做的人就会被贬抑为恶人。如果欺骗行为不惜一切代价做到了用“真理”一词来装点门面，那么，真正诚实的人就必然会获得最为糟糕的名声。对此，查拉图斯特拉有十分明确的表述，他曾说过，正是由于看清了善人、“最好的人”的实际面目，才使他对人产生了恐惧。这种厌恶之感令他长出了翅膀，“飞向位于远方的未来”。——他毫不讳言，自己这种类型是一种相对超人的类型，正是相对于好人成了超人，而且，那些好人和当道之人会称他这类超人为魔鬼……

你们这些我所目睹的至高之人啊！这是我对你们的质疑，我暗自在笑：我想，你们会称我这样的超人为魔鬼！

你们的灵魂与伟大相距甚远，以至超人的善意也会令你们感到可怕……

要搞明白查拉图斯特拉的意图，就要从这里起步，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他心目中的这类人将现实照其本来面目呈现了出来。他们足够强大，因此既不会歪曲现实，也不会脱离现实，他们就是现实本身。他们身上还拥有着现实那所有令人生畏和令人生疑的东西。正是这一点才使人拥有了伟大……

6

我选用“非道德论者”一词来标识自己并视为一个荣耀，这么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拥有这个称谓我感到自豪，它使我有别于所有人而显出特色。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藐视过基督教道德，为此要有高度，有远见，要达到迄今为止前所未有的心理深度和彻底性。基督教道德一向是所有思想家的喀尔科——他们都在为她效劳——在我之前，有谁曾深入到散发出理想（此乃对世界的诋毁呵！）这一毒气的深渊里去过呢？在我之前，有谁敢去想那是深渊呢？在我之前，哲学家中有谁还是心理学家？有谁还不是心理学家的反面，“超级大骗子”“理想主义者”呢？在我之前，根本还没有心理学。成为第一位心理学家可能意味着诅咒，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命运：因为你也是第一个去蔑视的人……我的危险就在于厌恶人……

7

明白我意思了吗？能够界定我的东西，能把我与所有其他人区分开的是，我揭露了基督教道德的真面目，因此我需要一种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的称谓。对此没有早点睁开眼看清楚，在我看来，就是整个人类要对之负责的最大污点，就是已成为本能的自我欺骗，就是根本上不愿意看到发生的一切事，无视一切因果和现实，就是心

理问题上近乎犯罪的欺骗。看不清基督教的真面目就是最大的罪行，是对生命犯下的罪孽。……几千年来，各个民族，先驱者和后来人，哲学家还有老妇人，除去历史上的五六个例外（我是第七个例外），在这一点上向来如此。

有史以来，基督教徒一直是“奉行道德之人”，是绝无仅有的怪物。——而且作为“奉行道德之人”，他们比人类的最大蔑视者能想象到的还要更荒谬、虚伪、自负、随意和有害。基督教道德带来的危害就是，造就了欺骗意志的最恶毒形式，使人蜕化变质。看清这一点后令我愤怒不已的，不是错误被确定为错误了，不是数千年来精神生活中缺乏“善良意志”、自律、守正和勇气，而是缺乏自然。我气愤的是出现了这种绝对可怕的事：反自然这样的东西成了道德而享有极高荣誉，并作为法则，作为绝对命令凌驾于全部人之上！……到了如此这般地步，迷失自我的就不是个人，也不是民族，而是整个人类……

基督教道德教人们轻视生命最基础的本能，捏造出“灵魂”和“精神”来羞辱身体，宣称生命的前提条件，也就是性行为是不洁的，从生命成长最基本的必然性中，也就是从严格的自我培育（这个词本身就具有诽谤意味）中建构出恶的原则；反过来又从标标准准的衰败和对本能的敌视中，从“抛弃自我”中，从失落主旨中，从“去除个体”和“博爱”（培育他人）中，建构出了更高的价值，也就是从中看到了价值本身之所在！……这是怎么了！难道人类本身已处于颓废中吗？人类一直是这样的吗？——可以确定的是，只有颓废价值作为最高价值在教给人类。

去除自我的道德就是最衰败的道德。“我在走向毁灭”这一事实陈述变成命令式就是“你们所有人都要走向毁灭”——而且这不仅仅是句式上变成了命令式！……这去除自我的道德是迄今为止被传授的

唯一道德，它代表着走向终结的意志，在对生命进行着最为彻底的否定。

这里还有一种可能：处于颓废状态的并非整个人类，而只是那些寄生虫式的人，即教士，他们利用道德爬上了价值决定者的位置，也就是说，把基督教道德作为他们攫取权力的手段。……其实，我看清楚的是：那些导师、人类引路者、全部神学家统统都是颓废者，所以，要将一切价值都重估为对生命的敌视，所以，道德……对道德下个定义：道德乃是颓废者的一种特异反应，潜藏的目的是报复生命而且如愿以偿。我认为这个定义有价值。

8

明白我意思了吗？我这里说的每一句话，五年前都已经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过了。揭露基督教道德的真面目是一件无与伦比的大事，即指出其是一场真正的灾难。谁阐明了这一点，谁就是强者，就是命运，这就是说，他将人类历史截成了两段：他之前和他之后的人类生活……这一真理射出的那道闪电击中的恰是迄今一直处于至尊地位的东西，谁搞清楚了这道闪电在那里摧毁的都是些什么，他就可以看下，自己手上是否还有什么剩下没被摧毁。

迄今奉为“真理”的一切都被看清楚，它们其实是谎言的最有害、最恶毒和最隐蔽的形式；“改善”人类这个神圣借口也被看清楚，它其实是吸干生命玉液的一个计谋，使生命处于缺血状态。道德被看清楚，它其实就是吸血鬼……凡揭开道德面具看清其本来面目的人，同时会发现，人们现在和过去所信仰的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这样，在最受尊敬的人，甚至所谓圣人身上，看到的就再也不是什么值

得尊敬的东西，而是最为可怕的畸形，之所以说最为可怕，是因为他们蛊惑人心……

臆造出来的“上帝”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一个反生命概念，一切有害的、有毒的、诽谤性的东西以及全部对生命的彻底敌意，在这个概念里汇聚成了可怕的一体！臆造出“彼岸”“真界”这样的概念，目的就是要贬低唯一实存的这个世界，是为了使我们实际的现实生活失去目标、理性和使命！臆造出“灵魂”“精神”，最后甚至还有“不朽的灵魂”这些概念，是为了贬低身体，使身体患病，失去肉体性，是为了让人忽视生命中一切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比如饮食、居住、精神食粮、治病、清洁和天气。忽视这些事情是多么可怕呵！不讲身体健康，而只讲“灵魂的拯救”，这可以说是一种在忏悔时发生痉挛与歇斯底里进行解救之间循环往复的精神病；臆造出“罪孽”这个概念以及“自由意志”这个与之伴随的刑具，为的是扰乱本能，使不依从本能成为人的第二天性！在“无我”，也就是“否定自己本身”这样的概念中，真正的颓废，受有害物引诱，再也看不到自身的用处以及自我毁灭，竟被弄成了价值所在，成了“义务”“神圣的”甚至是人身上的“神性”！最后，也是最为可怕的，在好人这个概念里，一切弱者、病者、畸形者和对自己不满者都包含在里面，而这全是些在走向衰亡的家伙，也就是说，淘汰法则被取消了，从令人骄傲的杰出之人的对立面，从肯定生命之人的对立面，从指向未来并呵护未来之人的对立面，造出了一个理想。现在我要说，这个理想其实就是邪恶之所在……可是，所有这一切都被当成道德信仰了！——消灭这样的信仰吧！

明白我意思了吗？狄奥尼索斯是反对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个人的……

不知道看什么书，关注公众号：三秋君
备用公众号：三秋菌 网址：sanqiu.cc



获取更多精品书籍，漫画，杂志

[91]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超越自己》。

[92]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旧石板与新石板》，略有改动。

[93]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将“适者生存”理论应用到社会学里，提出社会进化论，代表作有《社会静力学》。

[94]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旧石板与新石板》。

瞧，这个人

产品经理 | 段冶 装帧设计 | 董歆昱

产品总监 | 马伯贤 技术编辑 | 顾逸飞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出品人 | 吴畏